

城镇化与土耳其伊斯兰政党的崛起

王龙林*

【内容提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土耳其数个伊斯兰政党次第崛起。不同的人分别从宗教特性、政治和经济等角度分析了出现该现象的原因。借鉴前人的探索，本文选择从城镇化的视角对土耳其政治伊斯兰的崛起进行分析。第一，本文发现经济收入水平与伊斯兰政党支持率呈负相关关系。第二，本文亦发现土耳其存在明显的城乡经济分化，并进而推导出乡村居民较之城镇居民更倾向于支持伊斯兰政党的结论。第三，土耳其20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后经历了大规模城镇化，原本就更倾向于伊斯兰政党的乡村居民在移民后基本维持着既有的政治倾向。第四，在土耳其特殊的议会选举制度下，大规模城镇化也让伊斯兰政党原本分散在中西部省份的选票“聚零为整”地聚集到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等关键选举省份。如此，伊斯兰政党在城镇地区和全国范围内的支持率不断上升，这一结果则最终以地区选举和全国性议会选举的胜利体现出来。

【关键词】 城镇化 伊斯兰政党 土耳其 正发党 伊斯坦布尔

自1987年以来，土耳其先后有繁荣党、美德党以及正义与发展党（AKP，正发党）等伊斯兰政党角逐议会选举。其中，繁荣党、美德党先后四次参加全国大选，繁荣党经过三次选举便从土耳其第五大政党一跃成为第一大政党。在繁

* 王龙林，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

荣党解散后，美德党曾于 1999 年参加选举并成为议会第三大党。2002—2015 年，正发党更是连续四次力压共和人民党（CHP，共人党）赢得土耳其议会选举（见图 1），成为中东地区极为瞩目的政治现象。这不免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即为何伊斯兰政党能够在土耳其反复崛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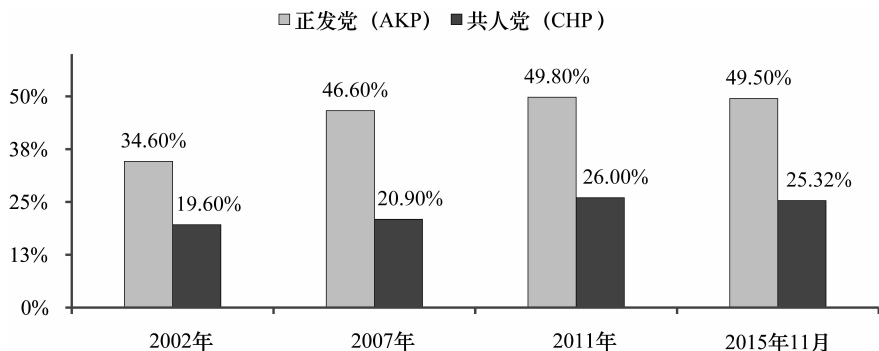


图 1 正发党与共人党 2002 年、2007 年、2011 年、2015 年 11 月四次全国大选得票率对比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 Akparti English, *General Elections*, <http://www.akparti.org.tr/english/secimler/genel/2011/> (February 22, 2017); Manuel Álvarez-Rivera, “Election Resources on the Internet: Elections to the Turkish Grand National Assembly,” <http://www.electionresources.org/tr/> 数据制图。

一 文献回顾与研究框架

鉴于土耳其在中东北非地区的重要性，学界对伊斯兰政党在土耳其崛起问题的研究颇为重视，总的来看，学界大致从伊斯兰教特性、经济、政治、社会结构及个人因素 5 个角度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第一，不少学者认为，伊斯兰政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崛起主要是得益于其宗教背景，或者说其“伊斯兰属性”。相较之世俗主义政党的思想，伊斯兰教的宗教教义能够更好地克服阶级、族群和性别差异并将这些政治力量团结起来。^① 因此，在绝大多数民众都是穆斯林的国家和社会，以宗教的名义宣扬政治议程显然更容易引起民众的共鸣。与之同时，调研报告也的确发现，在土耳其国民主要身

^① Mansoor Moaddel, *Class,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the Iranian Revolu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9–24.

份认同中，将穆斯林界定为第一身份的人数已经大幅上升并远远超过自认为是土耳其人和土耳其国民的人数（见图2）。换言之，土耳其民众正在变得越来越穆斯林化。^①在这种情形下，伊斯兰政党的群众基础势必随之增加，这自然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土耳其伊斯兰政党能够反复崛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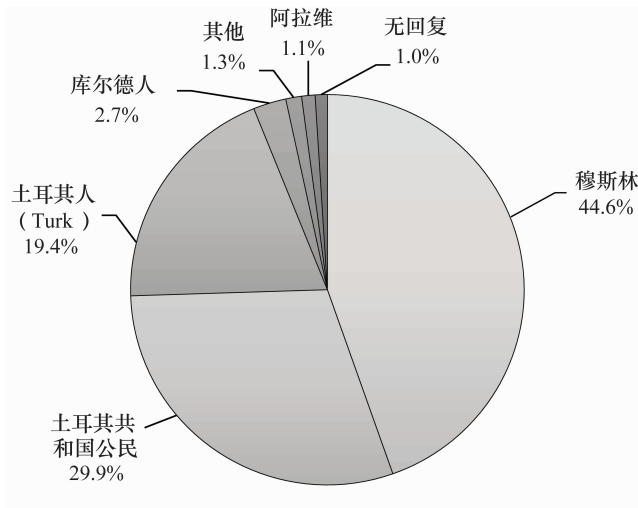


图2 土耳其国民主要身份认同

资料来源：Angel Rabasa and Larrabee F. Stephen, *The Rise of Political Islam in Turkey*, The RAND Corporation, 2008, p. 23.

第二，另有不少学者认为土耳其伊斯兰政党的崛起从根本上来讲仍然是经济问题。首先，部分学者认为崛起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长期停滞和财富分配高度失衡。卡拉克奇（Ekrem Karakoç）和巴席侃（Birol Başkan）根据对包括土耳其在内的40个国家的调研结果发现，经济分配不均（inequality）往往会提升民众对宗教在政治中的角色的积极认知。换言之，经济不公会导致民众对伊斯兰政党的支持度提升，对底层民众而言，这一趋势尤为明显。^②另外，部分学者则反过来认为经济治理的成功是伊斯兰政党不断崛起和长期执政的主因。一方面，土耳其20世纪末以来的出口导向（export-orientation）改革使得在传统的进口替代战略

① Madeleine K. Albright, Stephen J. Hadley and Steven A. Cook, *U. S. -Turkey Relations: Independent Task Force Report*,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12, p. 14.

② Ekrem Karakoç and Birol Başkan, “Religion in Politics: How Does Inequality Affect Public Seculariz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5, no. 2, pp. 1532 – 1535.

(import substitution) 中被边缘化的中小城市和安纳托利亚地区逐渐发展起来, 大量对伊斯兰教极其“虔诚的中产阶级”(Devout Bourgeoisie) 随之产生。^① 在这种背景下, “虔诚的中产阶级”和伊斯兰政党成为天然的盟友。而在联盟的过程中, 土耳其伊斯兰政党的意识形态也逐渐温和化。^② 另一方面, 伊斯兰政党治下的经济成功则进一步强化了其执政基础。奥马尔·塔石波纳(Ömer Taşpınar) 在分析土耳其正发党的时候就指出, 并没有什么政治伊斯兰力量的崛起, 正发党不断赢得选举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执政期内成功的经济政策。土耳其多数选民其实并不关心政党的意识形态倾向, “面包—黄油”才是选民们的最大关切。因此, 埃尔多安执政时期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福利的改善(尤其是医疗保险和住房福利)都促使选民一如既往地支持正发党。^③

第三, 一部分学者认为土耳其相对宽容的政治环境才是该国伊斯兰政党崛起的主因。所谓的“融入与温和化假设”(inclusion-moderation hypothesis) 认为, 随着国内政治的自由化, 伊斯兰政党继续推行激进路线的成本递增, 而接受并融入既有政治体制的收益却随之上升。因此, 不少伊斯兰政党在政治自由化的过程中选择了后者, 而且伊斯兰政党还在融入既有政治体制的过程中逐渐转变了意识形态。如此循环往复, 伊斯兰政党反复崛起的概率逐渐增大。^④ 比如, 有观察者就指出, 虽然土耳其政府反复取缔一些伊斯兰政党, 但并未完全禁止新的伊斯兰政党的组建, 也未禁止其参加选举。伊斯兰政党往往可以在部分修正其意识形态和政策方针后就改头换面, 东山再起。^⑤

第四, 社会结构是分析土耳其伊斯兰政党崛起的主要角度之一。不少学者认为包括土耳其在内的中东国家青年人口比例过高也是诱发政治动乱和政治伊斯兰崛起的深层次原因。因为, “青年人口暴增”(youth bulge) 本身就在较大程度上

① 在传统的进口替代战略下, 主要的受益者往往是与政府有裙带关系或者各种联系的利益集团或个人, 主要的受益地区则是伊斯坦布尔等大城市。参见 Sebnem Gumuscu, “Class, Status, and Party: The Changing Face of Political Islam in Turkey and Egypt,”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3, no. 7, pp. 839 – 840.

② Sebnem Gumuscu, “Class, Status, and Party: The Changing Face of Political Islam in Turkey and Egypt,” p. 856.

③ Ömer Taşpınar, “Turkey: The New Model?” *Brookings*, 2001,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turkey-the-new-model/>.

④ Sebnem Gumuscu, “Class, Status, and Party: The Changing Face of Political Islam in Turkey and Egypt,” p. 836.

⑤ Ömer Taşpınar, “Turkey: The New Model?,” *Brookings*, 2001,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turkey-the-new-model/>.

不利于社会稳定。如果青年人口暴增的同时还伴随着经济下行和失业增加等状况,政治动乱和武装冲突发生的概率就将显著上升。^①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土耳其的社会结构无疑恰好符合该解释。

第五,也有不少学者从个人角度(克里斯玛/超凡魅力领袖)分析了正发党持续选举胜利的原因。在他们看来,正发党领袖雷杰普·埃尔多安极其善于公开演讲的个人风格是该党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笔者在访谈康奈尔大学土耳其史学者莫斯塔法·米纳威(Mostafa Minawi)时,他就明确表示埃尔多安深谙普通大众的喜好,极善于利用公开演讲、提供免费食品等民粹主义(populism)的方式来笼络土耳其选民,这和唐纳德·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的原因如出一辙。^②

显然,上述五种解释方式均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土耳其伊斯兰政党崛起的原因。不过,美国华盛顿近东研究所土耳其项目主任索奈西·恰普泰(Soner Çağaptay)的初步观察对本文的启发最大。恰普泰注意到,自2002年以来,大量土耳其乡村居民(土耳其语:varoş)迁入城市并构成了城市人口的主体。这些移民一方面在经济上相对富裕,但在社会态度上却又相对保守,是非城非乡的“城市乡村人”(土耳其语:kentli-kırsal)。这些“城市乡村人”对宗教较为虔诚并持保守的社会态度,对世俗政党的左右翼均无兴趣,遂逐渐成为正发党的票仓。^③

遗憾的是,恰普泰并未深入论述城镇化与土耳其伊斯兰政党崛起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因此,在恰普泰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集中从城镇化的角度来深入分析土耳其伊斯兰政党的崛起。

为证明恰普泰等人观察到的城镇化与伊斯兰政党崛起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将分别证明以下几点:

第一,经济收入差异与个人的政治倾向有极强的相关关系,即经济收入越低便越倾向于支持伊斯兰政党,反之则不然。

第二,土耳其城乡居民之间存在明显的收入差异。结合第一点及第二点可知,城乡差异会导致城乡居民对伊斯兰政党支持度的差异。

① Henrik Urdal, *The Devil in the Demographics: The Effect of Youth Bulges on Domestic Armed Conflict, 1950–2000*, Washington, D. C. The World Bank, 2004, pp. 1–2.

② 笔者于2016年8月对米纳威教授的访谈。

③ Soner Çağaptay, *Secularism and Foreign Policy in Turkey*,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p. 21. 土耳其语以及更广泛的突厥语族中“kent”表示“城市”“城镇”。比如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Taškent)中的“taş”表示“石头”,“taş”与“kent”组成的“taşkent”即为“石头城”的意思。“kentli”表示“城市居民”,“kırsal”则表示“乡村居民”。

第三，土耳其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经历了大规模的城镇化。为谋求更好的经济、教育、社会机会，大量乡村居民在城镇化进程中涌入城镇地区并构成了城镇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

第四，乡村居民在进入城镇地区后并未快速融入，而是基本继续保持其原有政治倾向。因此，城镇地区的乡村居民逐渐成为伊斯兰政党的群众基础，伊斯兰政党崛起的可能性便随之增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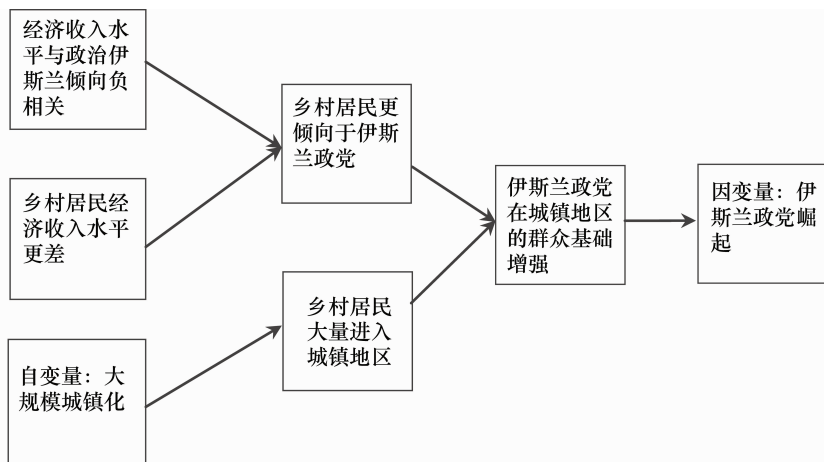


图 3 本文的核心假设及论证逻辑示意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结合以上论证逻辑，本文将综合采用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一方面，土耳其不少关键指标和数据均定时规范发布，借助对这些关键指标和数据的量化研究，文章的部分论证过程和论证结果会更加明了清晰。另一方面，在论证和考察的过程中也存在很多不可量化而更适合利用常规的政治、历史和哲学归纳、演绎等研究方法的地方。因此，本文也将在不便于量化研究的部分进行定性研究。

二 贫富分化与政治伊斯兰倾向的分化

首先，人均收入水平的差异是否意味着政治倾向的分化呢？具体到本文的研究问题而言，不同收入水平的土耳其选民对伊斯兰政党的态度是否有所不同呢？

(一) 初步检验

为此,笔者搜集了2002年、2007年、2011年以及2015年(11月)土耳其各省(土耳其语:il)人均GDP以及同期正发党的各省得票率数据并对两个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作了初步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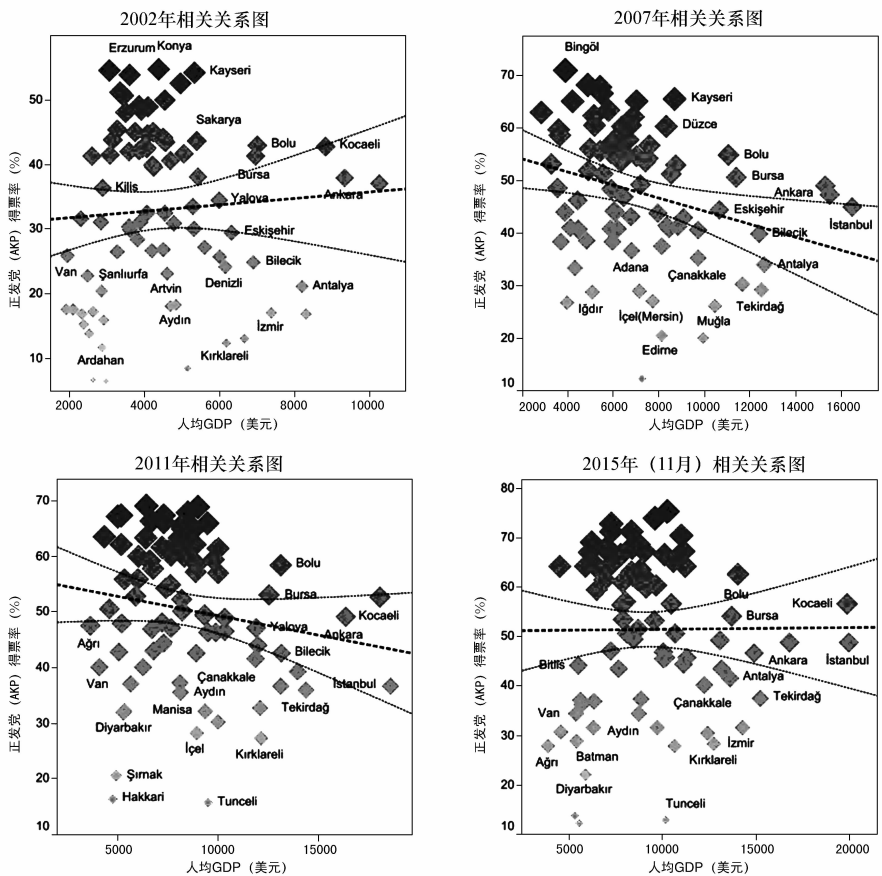


图4 土耳其各省正发党得票率与该省人均GDP相关关系初步检验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 Manuel Álvarez-Rivera, "Election Resources on the Internet: Elections to the Turkish Grand National Assembly," <http://www.electionresources.org/tr/>; Turkish Statistical Institute, *İl Bazında Gayrisafi Yurtiçi Hasıla*, 2004 - 2014 (2004—2014年间各省人均收入), <http://www.tuik.gov.tr/MetaVeri.do?id=24920&frame=true> 信息制图。

从图 4 可以发现,整体而言,得票率越高的省份的人均 GDP 的确就越低(反之亦然)。但即便如此,四组相关关系图中存在的不少异常数据组非常值得关注:迪亚巴克尔(Diyarbakır)、通杰利(Tunceli)、哈卡里(Hakkâri)等东南省份人均收入很低但正发党的得票率也很低;与其情形恰好相反,伊斯坦布尔(Istanbul)、安卡拉(Ankara)、科贾埃利(Kocaeli)等省份虽然人均收入很高,但正发党在这些省的得票率却偏高。^①这似乎表明人均收入与正发党得票率之间的线性相关关系并不明显。

众所周知,在统计学中,P 值(*p*-value)是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线性相关关系的简易指标之一。为了检验上述感性认知是否正确,笔者进一步分别计算了四组数据的 P 值。如表 1 所示,四组数据的 P 值分别为:0.574886、0.0109351、0.144369 以及 0.948767。根据常识,P 值低于 0.05 才能初步证明变量之间存在线性相关关系。可见,这四组相关关系中,仅 2007 年较好地契合本文所试图证实存在的“线性相关”。P 值的检验结果似乎再度验证了初步感性认知。

表 1 四组数据的相关关系数据^②

	拟合优度 (R-Squared)	P 值 (<i>p</i> -value)
2002 年	0.0039992	0.574886
2007 年	0.0791787	0.0109351
2011 年	0.0267774	0.144369
2015 年 11 月	5.259e - 05	0.948767

资料来源:根据以上数据计算。

(二) 剔除离群值后再度检验

如上所述,东南诸省、西部沿海诸省以及首都安卡拉等省份均是明显的

^① 括号中的名称皆为土耳其语。

^② 所谓“拟合优度”又称“决定系数”,即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记为 R^2 或 r^2 。在统计学中,“拟合优度”是检验模型解释力的一个工具。决定系数的值位于 0 到 100% 之间,其值表示模型所能解释的结果变量的比例。换言之,其值越接近 100% 就表示模型越具有解释力。若该值为 100% 则意味着所有的结果变量都能由该模型解释。参见 David Freedman, Robert Pisani, and Roger Purves, *Statis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7, pp. 125 - 128。P 值 (P-value) 同样是统计学中的一个重要检验工具。一般认为,如果 P 值小于等于 0.05 则意味着检验中的原因变量和结果变量之间存在某种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且与“决定系数”相反,P 值越小意味着相关关系越显著。近年来,有不少学者质疑 0.05 这一数据门槛甚至 P 值本身的科学性。参见 Ronald L. Wasserstein, and Nicole A. Lazar, “The ASA’s Statement on P-Values: Context, Process, and Purpose,” *The American Statistician*, vol. 70, no. 2, 2016, pp. 129 - 133。

“离群值”(outlier)。离群值往往会扰乱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在可能的情况下,科学地剔除离群值能够更好地检验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①因此,本文将尝试剔除东南诸省以及伊斯坦布尔、安卡拉等大城市以再度检验四组数据之间的线性相关关系。

1. 东南诸省(库尔德人聚居区)的剔除

东南诸省收入水平普遍较低,但正发党在这些省份的得票率也偏低。东南诸省为什么与土耳其其他多数省份如此迥异呢?对土耳其国内政治稍加考察就发现,该国东南部是库尔德人聚居区。^②自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来,库尔德人便是该国最大的少数民族(ethnic group)。由于库尔德人人口众多且有分离倾向,土耳其政府长期以来均不在其人口统计中将库尔德人单列出来。当下,人们只能通过调研等方式对其人口总量进行大致估算。据估算,库尔德人的人口约占土耳其总人口的18%左右,亦即1400万左右。^③包括迪亚巴克尔、通杰利、哈卡里、马尔丁、舍尔纳克、锡尔特、巴特曼、比特利斯、凡城、厄德尔、阿勒、穆什在内的东南诸省皆为库尔德人聚居省份。

由于文化、族群、政治、宗教等各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库尔德人与土耳其政府的矛盾迟迟未能化解。在图尔古特·厄扎尔担任总理之前,土耳其政府有意将库尔德人称为“山地土耳其人”(mountain turks)以否定其独立族群属性,库尔德语教育、电台、出版物也长期遭到禁止。1984年开始,库尔德工人党(库尔德语:Partiya Karkerên Kurdistanê, PKK)成立并开始进行武装斗争。^④持续不断的武装斗争以及土耳其东南诸省本身地形多山区等自然因素导致库尔德人聚居诸省的人均收入水平远低于全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政治上,大量库尔德人政党及独立候选人的持续存在,使得库尔德人聚居的土耳其东南诸省一直以来都是这些政党和独立候选人的票仓。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民工人党(HEP)、民主党(DEP)、民主人民党(DEHAP)、民众民主党(HADEP)以及人民民主党

① David Freedman, Robert Pisani, and Roger Purves, *Statistics*, 4th edi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7, p. 147.

② 据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Xenophon)记载,早在公元前5世纪,库尔德人便已经定居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东南部。

③ The Religious Literacy Project at Harvard Divinity School, *Kurds in Turkey*, <https://rlp.hds.harvard.edu/faq/kurds-turkey>. 巴黎库尔德人研究所(Kurdish Institute of Paris)的估计则多至1500万—2000万人。参见Kurdish Institute of Paris, *The Kurdish Population*, <http://www.institutkurde.org/en/info/the-kurdish-population-1232551004>.

④ Helen Chapin Metz, *Turkey: A Country Study*, Library of Congress, pp. 98 - 100.

(HDP) 等库尔德人政党先后成立。^① 其中, 人民民主党曾参加 1995 年、1999 年全国议会选举, 民主人民党曾参加土耳其 2002 年全国议会选举,^② 人民民主党 (HDP) 曾参加 2015 年全国议会选举。^③

笔者考察了自 2002 年以来土耳其全国议会选举数据, 发现正发党在东南诸省的得票率一直偏低。如图 5 所示, 在 2002 年土耳其全国议会选举中, 正发党全国平均得票率为 34.30%。与之同时, 代表库尔德人的区域性政党民主人民党 (DEHAP) 横扫东南诸省, 正发党在这些省份的平均得票率仅为 17.05%。^④ 如果剔除这 12 个省份, 正发党在其余 69 个省份的平均得票率则为 35.32%。可见, 库尔德人聚居的省份拉低了正发党在土耳其全国的平均得票率。

另外, 在 2007 年和 2011 年的全国议会选举中, 库尔德人政党抛弃了以往以政党形式参选的做法而改为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 这有效规避了政党必须至少获得全国 10% 的选票才能在议会获得席位的门槛。这些独立候选人在 2007 年的选举中仅以 5.24% 的全国得票率便赢得了 26 个议会席位。在 2011 年的选举中, 库尔德人独立候选人更是以 6.57% 的得票率赢得了 35 个议会席位。虽然受独立候选人选票分散等因素的影响, 正发党在东南诸省的得票率有所上升, 但整体而言, 正发党在这些省份的得票率仍然低于其在全国范围内以及剔除这些省份后的 69 省的得票率。在 2015 年 11 月的选举中, 库尔德人政党人民民主党 (HDP) 重新以政党的形式参选并历史性地突破了 10% 的最低门槛。人民民主党在东南诸省的胜利导致了正发党在这一地区得票率的再度走低。如图 5 所示, 正发党在此次选举中仅仅在东南 12 省得到 26.93% 的选票, 而其在全国以及除东南诸省之外的 69 省的得票率却分别高达 49.5% 以及 51.10%。简言之, 与土耳其其他多数省份不同, 一方面, 库尔德人聚居的东南诸省经济状况较差; 另一方面, 库尔德人政党和独立候选人的持续存在则使得全国性政党始终无法在该地区获得半数以上的选票。可见, 库尔德人聚居的东南诸省的选举政治业已形成了自己的“小气候”。本文试图考察的经济发展、城镇化等变量对这一地区议会选举

① 由于政治原因, 上述的多数政党存在时间较短, 且均遭到政府禁止。

② 其中, 民众民主党 (HADEP) 已经于 2003 年解散。

③ 土耳其选举法规定, 政党必须至少获得全国 10% 的选票才能在议会获得席位。这一门槛对于库尔德人政党而言颇为苛刻, 而独立候选人则不受此限制。因此, 在 2007 年和 2011 年的全国议会选举中, 库尔德人议员均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

④ 该党虽然在东南诸省占据主导地位, 但其得票总数仅占全国有效选票的 6.22%。这一得票率未能达到土耳其选举法规定获得议会议席的最低得票率, 即 10% 的门槛。因此, 民主人民党虽然在东南诸省的选举中获得了较大的胜利, 但其并未获得议会席位。

的影响微乎其微。出于考察的需要,本文可以合理地将库尔德人聚居的12个省份整体排除在考察范围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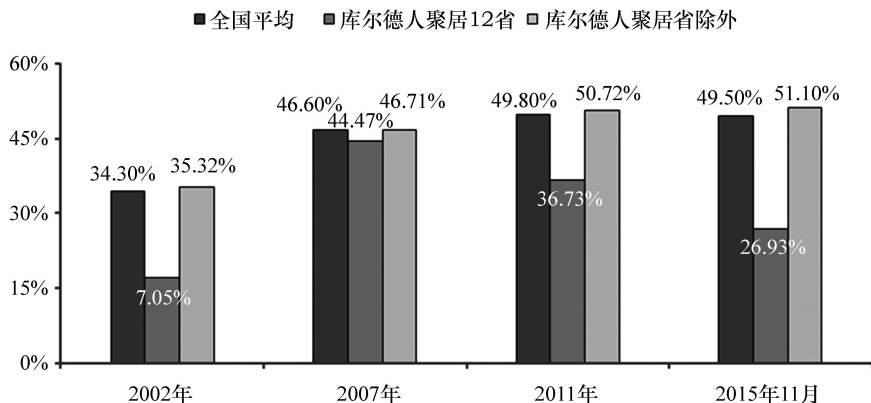


图5 正发党全国平均、库尔德人聚居12省及库尔德人聚居省份除外平均得票率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土耳其历年选举数据计算得来。参见 Election Resources on the Internet, *Elections to the Turkish Grand National Assembly*, <http://www.electionresources.org/tr/>。

2. 特殊省份的剔除

如上所述,伊斯坦布尔、安卡拉等省份也同样与土耳其全国的选举形势大为不同。一方面,就人均收入水平而言,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的人均收入远超土耳其全国的人均水平。以2002年为例,该年度土耳其全国人均收入仅4423美元,而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同期的人均收入却分别高达10235美元和9302美元。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人均收入两倍甚至数倍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这一局面直到2015年也没有实质性改变。另一方面,与多数人均收入水平偏高的省份不同,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对正发党的支持并没有因为其收入水平偏高而降低。

为了对比,有必要将正发党在土耳其人均收入较高的省份的平均得票率状况进行统计。根据计算,土耳其2002年、2007年、2011年和2015年的四个年度的人均收入分别为4423美元、7098美元、8527美元以及9202美元。下面将选取这四个年度均超过土耳其全国人均收入的28个省份进行分析。^①

① 28个省份分别为:安卡拉、安塔利亚、阿尔特温、巴勒克埃西尔、比莱吉克、博卢、布尔萨、布尔杜尔、恰纳卡莱、代尼兹利、迪兹杰、埃迪尔内、埃尔津詹、埃斯基谢希尔、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卡拉曼、开塞利、克尔克拉雷利、科贾埃利、马尼萨、穆拉、里泽、萨卡里亚、泰基尔达、通杰利、乌沙克、亚洛瓦。

根据土耳其历年的选举和各省人均收入数据，笔者制作了如图6所示的对比图表。不难发现，作为人均收入更高的28个省份对正发党的支持率明显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正发党在这28个省份的平均得票率分别为29.63%、43.50%、48.18%和47.83%。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全国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的三个省份，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科贾埃利（以下简称“伊安科三省”）对正发党的支持率则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正发党在伊安科三省的平均得票率分别为37.90%、46.15%、49.61%和49.58%。尤其是在2002年的选举中，正发党在三省的平均得票率甚至超过其全国平均水平3.5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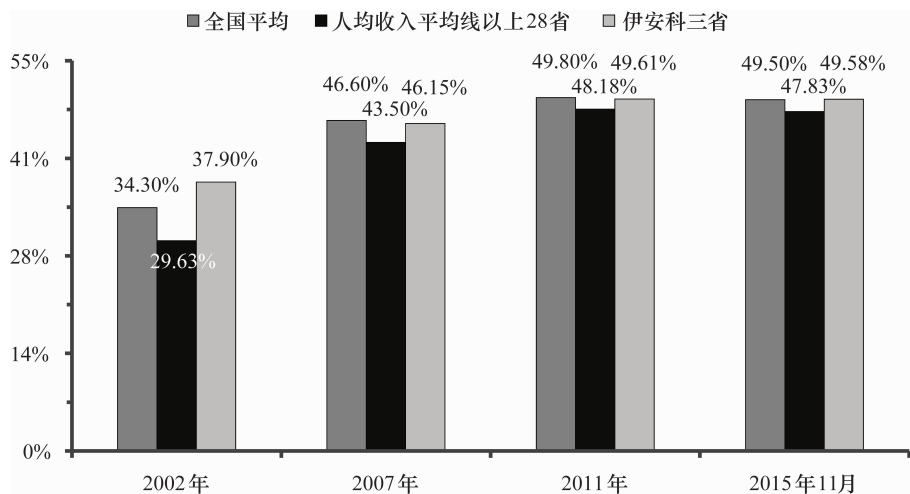


图6 正发党在伊安科三省、28个人均收入在平均线以上的省份和全国的平均得票率对比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 Manuel Álvarez-Rivera, “Election Resources on the Internet: Elections to the Turkish Grand National Assembly,” <http://www.electionresources.org/tr/>; Turkish Statistical Institute, *İl Bazında Gayrisıfı Yurtiçi Hasıla*, 2004 - 2014 (2004—2014年间各省人均收入), <http://www.tuik.gov.tr/MetaVeri.do?id=24920&frame=true> 信息制图。

简言之，伊安科三省对正发党的支持率不仅高于人均收入水平偏高的28个省份的平均值，甚至高于全国平均值。正是这个原因，伊安科三省在相关关系图中就显得尤其“离群”。为了使得检验更具代表性，我们也可以合理地暂时将伊安科三省剔除在考察范围之外。

（三）检验结果

在剔除了库尔德人聚居12省和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科贾埃利三省之后，

笔者对土耳其自2002年以来的四次全国议会选举中正发党的得票率和各省的人均GDP之间的相关关系作了第二次检验,结果如图7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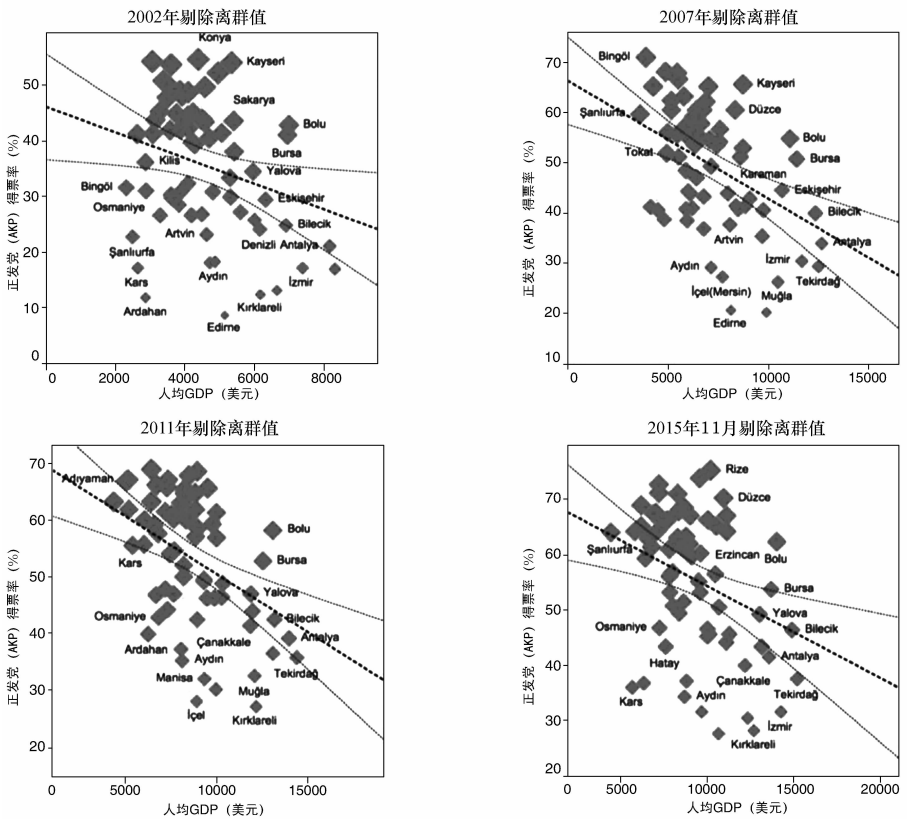


图7 剔除库尔德人聚居区及伊安科三省离群值后的检验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 Manuel Álvarez-Rivera, “Election Resources on the Internet: Elections to the Turkish Grand National Assembly,” <http://www.electionresources.org/tr/>; Turkish Statistical Institute, *İl Bazında Gayrisafi Yurtiçi Hasıla*, 2004 - 2014 (2004—2014年间各省人均收入), <http://www.tuik.gov.tr/MetaVeri.do?id=24920&frame=true> 信息制作。

据此可以计算出四组数据的具体相关关系参数,见表2。显然,四组关系数据的P值均远小于0.05,这意味着,四组数据中“正发党得票率”和“人均GDP”之间的线性相关关系均相当显著。换言之,该检验结果发现特定省份的人均收入水平与正发党在该省的得票率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负相关关系:即人均收入水平越高,正发党的得票率就越低。不难看出,库尔德人聚居12省和伊安科

三省的剔除使得其他省份的正发党得票率和人均收入水平之间的线性相关关系显著增强（2007 年和 2011 年尤其显著）。

表 2 四组相关关系的分析数据

	拟合优度 (R-Squared)	P 值 (p-value)
2002 年	0.077416	0.0226177
2007 年	0.211952	<0.0001
2011 年	0.207589	0.0001069
2015 年 11 月	0.125929	0.0029846

资料来源：根据图 7 数据计算而来。

三 土耳其的城乡经济分化

上文的分析已证明经济收入差异与对伊斯兰政党的支持度高度相关，下面将通过量化方法分析土耳其城乡经济分化状况。

（一）土耳其的城市与乡村

与多数国家以“城镇人口”（urban population）和“乡村人口”（rural population）对整体人口分布状况进行统计不同，土耳其政府长期以来均使用“省市中心人口”（population of province/district centers）与“村镇人口”（population of towns/villages）两大类进行统计。^① 2012 年以前，尽管统计的术语不同，但土耳其政府的这种统计方法基本反映了该国人口的整体分布状况。据土耳其官方的统计数据，该国在 2011 年的全国总人口为 7472.43 万人，其中所谓的“省市中心人口”和“村镇人口”的比例分别为 76.8% 和 23.2%。^② 这一结果与世界银行提供的 71.28% 和 28.72% 出入不大。^③

2012 年后，土耳其政府颁布的 6360 号法令使得该国的人口统计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根据该法令，土耳其的 81 个省份被分为 30 个“大都会省份”

① 省市中心人口的土耳其语为：İl ve ilçe merkezi nüfusu。“村镇人口”的土耳其语为：Belde ve köy nüfusu。

② *İstatistiklerle Türkiye 2013*（2013 年土耳其统计数据），Ankara, Türkiye: Türkiye İstatistik Kurumu（土耳其统计局），2014, p. 11.

③ World Bank, *Urban Population (% of Total)*,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urb.totl.in.zs>.

(土耳其语: büyükşehir belediyeleri) 以及 51 个“其他省份”(Diğer il)。所有人口超过 75 万的省份皆被纳入“大都会省份”。^① 相反, 人口在 75 万以下的省份则被归类为“其他省份”。其中, 30 个大都市省份的人口全部被视为城镇人口, 只有剩下的 51 个“其他省份”的人口统计中才存在部分的乡村人口。

由于这种统计学上的变动, 土耳其数以万计的“村镇”(Belde ve köy) 行政单位被重新归类为代表城镇建制的“区”(ilçe)。从土耳其官方发布的《土耳其统计数据 2014》数据来看, 土耳其 2012 年的“区”和“村镇”分别是 892 个和 36411 个, 而到了 2013 年, “区”的数量陡增至 919 个, 而“村镇”的数量则暴跌至 18608 个。这意味着仅仅因为统计方法的差别, 土耳其约有 17803 个“村镇”被纳入“区”的类别中去了。^② 由于这种统计方法与国际通行的惯例相左, 其统计的结果也与国际通行的数据大相径庭。根据该统计方法, 土耳其的“省市中心人口”在 2012 年占比尚且为 77.3%, 而仅仅在修改统计办法之后的 2013 年, 这一比例就骤升至 91.3%。^③ 根据世界银行以及联合国等机构的标准统计方法, 土耳其的城镇人口比例截至 2014 年仅为 73.40% 左右。^④

可见, 新的统计方法使得土耳其的城乡人口统计数据与其历史数据和国际数据均有较大出入, 存在不合理的地方。比如, 30 个所谓的“大都会省份”内部必然也存在一定比例的乡村人口。如果笼统地将这些省份 100% 的人口统一视为“省市中心人口”, 那么城镇人口就会被严重高估; 相应地, 乡村人口的比例则会被严重低估。^⑤ 因此, 理论上不可能通过权威的渠道获得土耳其 2012 年以后各省具体的城乡人口比例数据。但根据历史数据以及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 土耳其目前的城镇化率理应仍在 75%—80%。换言之, 土耳其尚有约 20% 的人口居住在乡村地区。

① 在土耳其语中, “şehir”表示“城市”“城区”, 而“büyük”则表示“大”“伟大”的意思。Büyükşehir即“大都会”之意。其中 30 个大都会省包括: 阿达纳、安卡拉、安塔利亚、艾登、巴勒克埃西尔、布尔萨、代尼兹利、迪亚巴克尔、埃尔祖鲁姆、埃斯基谢希尔、加济安泰普、哈塔伊、梅尔辛、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开塞利、科贾埃利、科尼亚、马拉蒂亚、马尼萨、卡赫拉曼马拉什、马尔丁、穆拉、奥尔杜、萨卡里亚、萨姆松、泰基尔达、特拉布宗、尚勒乌尔法、凡城。

② İstatistiklerle Türkiye 2014 (2014 年土耳其统计数据), Türkiye İstatistik Kurumu (土耳其统计局), 2015, p. 9.

③ Turkish Statistical Institute, *The Results of Address Based Population Registration System 2016*, <http://www.turkstat.gov.tr/PreHaberBultenleri.do?jsessionid=rgyszggbvqnwxppx4bhptfpzxl9j10btrdqrcqjjfty7yx1y2wd!1568056020?id=24638>.

④ World Bank, *Urban Population (% of Total)*,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urb.totl.in.zs>.

⑤ Ali Özçağlar, *Büyükşehir Belediyeli İllerde Kırsal ve Kent Nüfusunun Tespiti Mümkün mü? (Is it likely to decide the actual rural and urban population in provinces governed by metropolitan municipalities?)*, p. 271.

（二）城乡差异与人均收入的分化

众多研究均认为城乡差别与收入不均之间存在直接关联。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发布的《世界社会状况报告 2013》（*Inequality Matters: Report of the World Social Situation 2013*）称，出生地域（Where people are born）和生活地域（Where they live）能够持久地影响个人的发展。相对于乡村而言，城市地区的生产力明显更高，再考虑到集聚效应，城市的生产力比较优势被进一步扩大。因此，相对于乡村居民而言，城市居民的经济收入更高、享受的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也更好。从全球范围来看，这种城乡差距广泛存在，在发展中国家这一现象则更为明显。在部分国家，其国内的城乡差距甚至大于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城乡之间的这种持久而巨大的不均衡被称为“空间性贫困陷阱”（spatial poverty traps）。^①

与世界上多数国家一样，土耳其城镇居民与乡村居民之间也存在较为显著的人均收入差距。具体而言，城镇居民的收入整体高于乡村居民。笔者选取了 2002 年的土耳其各省“省市中心人口”与“各省人均收入”的数据并对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做了简单的分析，结果如图 8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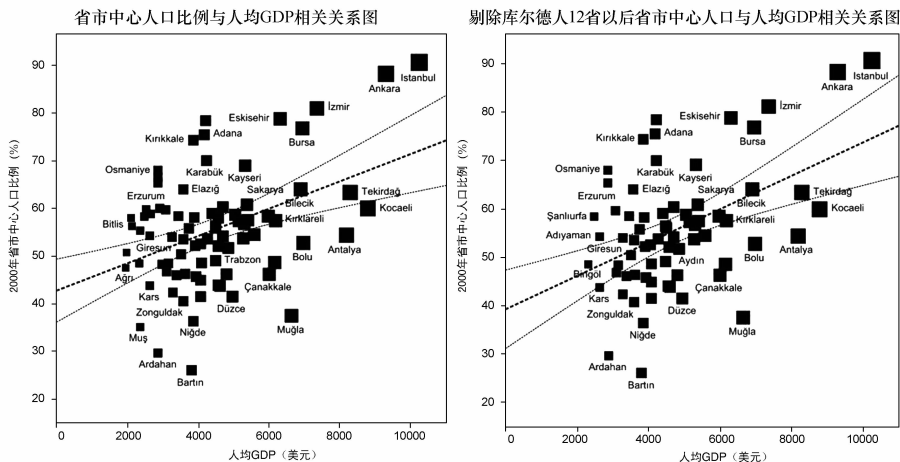


图 8 2002 年省市中心人口与人均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

注：其中，城乡人口比例为 2000 年数据；人均收入为 2004 年数据。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① *Inequality Matters: Report of the World Social Situation*, New York: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ited Nations, 2013, p. 56;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equality and Regions*, <http://www.oecd.org/social/inequality.htm>.

可以发现,数据较为集中地分布在回归线周围,回归线斜率为正数并呈上扬趋势。这意味着城镇化率与人均GDP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城镇化率越高该省的人均GDP也就越高。换言之,从微观层面来讲,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比乡村居民更高。此外,从表3的相关关系系数可以看出,剔除库尔德人聚居的12个省份以后,拟合优度有部分提升,但就P值而言,无论库尔德人聚居的省份剔除与否均小于0.0001,就是说,土耳其全国81个省份几乎均适用于“城镇化率越高该省人均GDP就越高”的普遍规律。

表3 相关关系系数值

	拟合优度 (R-Squared)	P 值 (p-value)
未剔除库尔德人聚居 12 省前	0.175943	<0.0001
剔除库尔德人聚居 12 省后	0.213721	<0.0001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其实,不少前人的研究成果也很好地验证了该结论。艾思拉·萨阿特吉(Esra Saatci)等人的研究就发现,土耳其多数贫困人口居住在乡村地区。以2006年为例,该国接近62.9%的贫困人口居住在乡村,其余约37%的贫困人口则居住在城市。其中,东部和东南部省份的乡村居民的处境尤其困难。^①

如上所述,在剔除离群值以后,各省的人均收入水平与正发党的得票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部分的分析表明,城镇化率与人均收入水平高又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综合两部分的论证可知,越是城镇化率高的省份,其对正发党的支持率就应该越低;反之,城镇化率越低的省份,其对正发党的支持率就应该越高。换言之,乡村居民对正发党的支持率理论上应略高于城镇居民。

四 土耳其城镇化与城镇地区的伊斯兰化

如前文所述,正发党在人均收入高于土耳其全国平均水平的28个省份的得票率的确明显略低于该党在全国(尤其是在人均收入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的平均得票率。不过,这一检验结果得益于对“库尔德人聚居12省”和

^① Esra Saatci and Ersin Akpınar, "Assessing Poverty and Related Factors in Turkey," *Croatian medical journal*, vol. 48, no. 5, 2007, p. 632; Ayşe Buğra, Volkan Yılmaz, and Alpkan Birelma, *Inequalities in Turkey: An Overview*, UNDP, 2016, pp. 44–45.

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科贾埃利三省这些离群值的剔除。

离群值的剔除需要基于合理的原因。库尔德人的聚居是剔除土耳其东南 12 省的合理原因。那么，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科贾埃利三省的剔除也必须有正当合理的理由。与族群构成高度易质化的东南诸省不同，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科贾埃利三省与土耳其其他诸省的族群构成接近，族群因素也就不能成为剔除伊安科三省的合理因素。此外，这三省和其他 27 个大都会省份一样同属人均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① 这意味着伊安科三省这三个离群值与前文的结论几乎完全相反。

（一）城镇化与国内人口迁移

伊安科这三个“离群值”的存在是否就证伪了本文上一部分的结论呢？从表面上来看是的。但若进一步深入考察这些“离群值”却能强化上一部分的结论并引导出本文的第三个论点。下文就将从城镇化与国内人口迁移的角度进行深入探讨。

如图 9 所示，土耳其城镇化率折线的斜率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明显增大，这意味着其城镇化开始加速。^② 据确切统计，土耳其的城镇化比例从 1983 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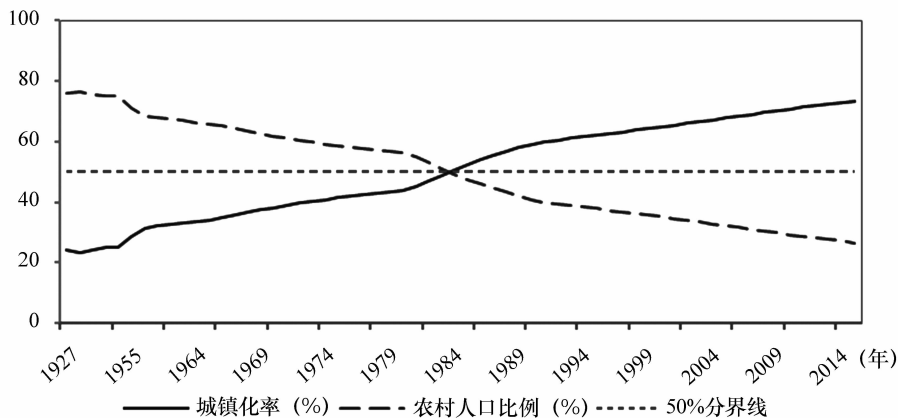


图 9 1960—2014 年间的土耳其城镇化率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 World Bank, *Urban Population (% of Total)*,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urb.totl.in.zs> 以及 Ceren Coban, “Different Periods of Internal Migration in Turke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Americ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Research*, vol. 3, no. 10, 2013, p. 64 信息制图。

① 伊安科三省的人均收入水平几乎均位列全国前三名。

② 如上所述，土耳其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与国际标准不同。因此，此处采用世界银行的公开数据。

48.1% 飙升至 2002 年（正发党首次赢得全国议会选举）的 65.95%。截至 2015 年，该国的城镇化率又在 2002 年的基础上增至 73.4%。

著名美国中东研究、奥斯曼帝国史专家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就认为，土耳其人对“西迁”有种无止无尽的痴迷：1000 多年前，土耳其人退出中亚转而皈依伊斯兰教并西迁至伊朗、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地区；近代以来，土耳其人再度扬弃了部分伊斯兰传统并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各方面转向西方；而最近数十年来，该国进一步试图加入欧盟。^①

恰如刘易斯所言，土耳其人这种对“西迁”的痴迷也体现在其国内的人口迁移上。自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来，该国大量的中部省份和东部省份的民众纷纷迁往西部省份。如图 10 所示，土耳其全国 81 个省份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东中西三部分。在 1965 年时，东中西三部分的人口数量均大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33% 左右。但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中部人口开始大规模迁徙至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逐渐由 1965 年的 34% 增长至 2012 年的 49%（即约全国人口的一半）。而与之同时，中部地区的这一比例则锐减至 23%，东部地区的这一比例则小幅减少至 28%。^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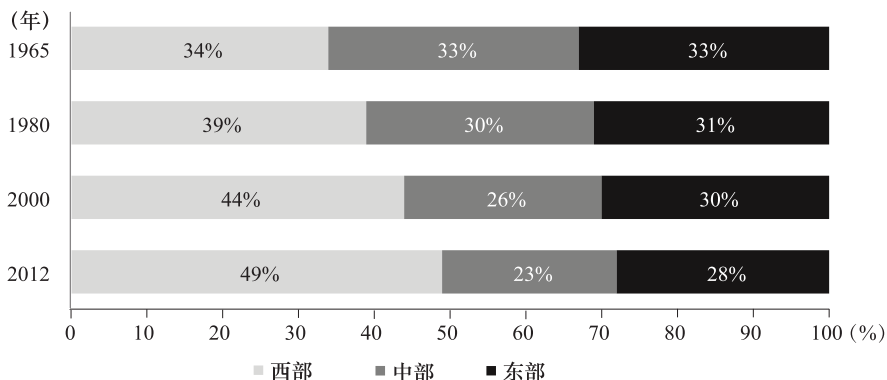


图 10 土耳其东中西部之间人口比例变化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 Güven Sak, “Internal Migration Dynamics in Turkey”, *Hürriyet Daily News*, 2014, <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internal-migration-dynamics-in-turkey.aspx?page-id=449&nid=70793&newscatid=403> 信息整理。

① Bernard Lewis,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 3r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486.

② “Central Turkey Leads in Internal Migration,” *DailySabah*, <https://www.dailysabah.com/turkey/2014/11/16/central-turkey-leads-in-internal-migration>.

口最多的省份前列。以1980—2016年间(除1990—1995年五年以及2000—2007年外)为例,伊斯坦布尔省总迁入人口为678.83万人,同期科贾埃利的这一数据则为106.27万人。此外,科贾埃利省与泰基尔达省分别在东西两方与伊斯坦布尔省接壤。换言之,伊斯坦布尔、科贾埃利和泰基尔达三省(甚至包括亚洛瓦省、布尔萨省)甚至可以合并为一个“大伊斯坦布尔地区”。如此,该地区的迁入人口则约为779.68万人。紧随伊斯坦布尔之后,安卡拉省在这一期间的迁入人口达259万余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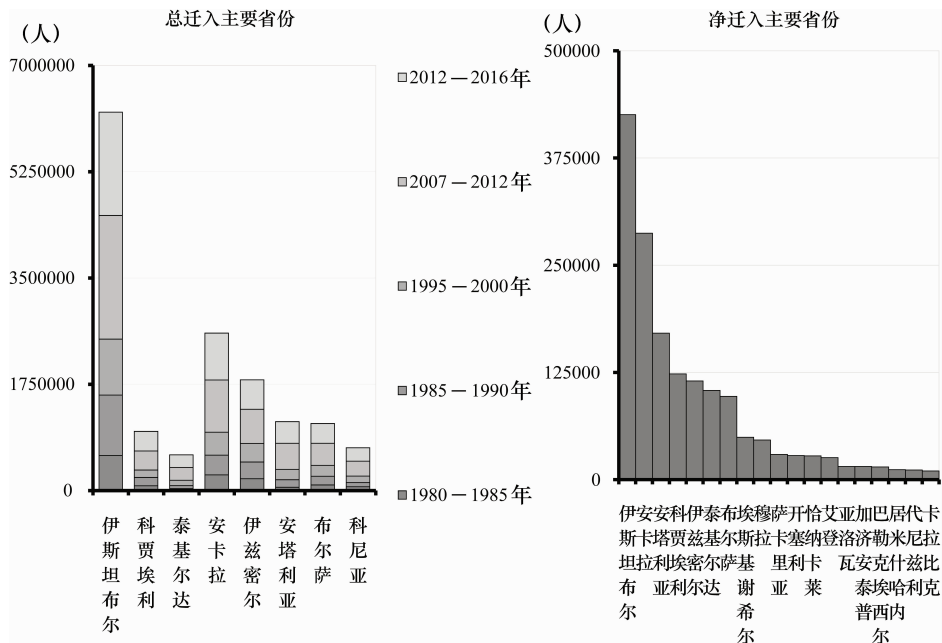


图 12 1980—2016 年土耳其主要总迁入及净迁入省份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İllerin Aldığı, Verdiği Göç, Net Göç ve Net Göç Hızı, 1980 - 2016 (1980—2016 年间各省迁入、迁出、净迁入比例),” 2017, <http://www.turkstat.gov.tr/Start.do>。注:笔者制图。其中,“净迁入”即“迁入人口”减去“迁出人口”后的数值。“迁出”和“迁入”往往同时发生,总迁入人口不计算人口迁入同时的迁出人口。因此,相对于“总迁入人口”,“净迁移人口”的数值相对小很多。此外,由于统计原因,1990—1995 年与 2000—2007 年数据缺失。

此外,就各个时间段的增量来看,各省的人口迁入量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增长。比如,伊斯坦布尔省在 1980—1985 年 5 年间的迁入人口总量仅为 57.68 万人。而 2007—2012 年的 5 年间,该省的迁入人口总量则高达 203.78 万人。换言之,后一时间段内,伊斯坦布尔省的迁入人口量增加了 3 倍左右。安卡拉省也同

样适用这一规律。该省在 1985—1990 年的 5 年时间内的迁入人口量仅为 25.75 万人。而 2007—2012 年这 5 年间的迁入人口量已增长至 85.99 万人。就“净迁入”这一指标而言，伊斯坦布尔、安卡拉、科贾埃利等省依然位居前列，三省的净迁入人口约占全土耳其各省净迁入人口总量的一半以上。

（二）城镇化与城市的贫困化

1. 棚户区问题

大量人口迁入给城镇地区带来了一系列影响。首先，人口迁入直接导致了迁入城市、省份人口的暴增。与多数发展中国家类似，土耳其的工业化步伐远慢于其城镇化的进程。原本的城镇居民的内生性增长加上涌入的外来移民往往会导致基础设施、市政服务和就业机会的严重缺乏。此外，土耳其城市外来移民的绝对主力是中东部地区及全国其他地区的乡村居民^①，就业机会缺乏以及这些外来移民本身就业能力不足等问题使得外来移民（尤其是乡村移民）往往难以获得稳定的、充足的经济来源。经济状况不佳又使得外来移民无力购置房产。为了满足基本的居住需求，大量外来移民只能在郊区私自搭建临时住所，这些临时住所不断聚集扩大就最终演变成了棚户区。^②

“棚户区”在土耳其语中为“Gecekondu”。在土耳其语中，“gece”表示“一晚、晚上”，“kondu”是动词“Konmak”的过去时形式，“konmak”表示“栖息、驻扎、突然拥有”等。“Gecekondu”顾名思义就是“一夜之间搭建起来的临时住所”，即所谓的“棚户区”（Shantytown）或者“违章建筑”（Squatter Settlements）。^③ 根据土耳其 1966 年的第一份棚户区法律文件的官方界定，所谓

① Halil I. Tas and Dale R. Lightfoot, “Gecekondu Settlements in Turkey: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the Developing European Periphery,” *Journal of Geography*, vol. 104, no. 6, 2005, p. 267; Tahire Erman and Aslyhan Eken, “The ‘Other of the Other’ and ‘unregulated Territories’ in the Urban Periphery: Gecekondu Violence in the 2000s with a Focus on the Esenler Case, Istanbul,” *Cities*, vol. 21, no. 1, 2004, p. 57.

② Ş İlgü Özler, “Politics of the Gecekondu in Turkey: The Political Choices of Urban Squatters in National Elections,” *Turkish Studies*, vol. 1, no. 2, 2000, p. 42.

③ 棚户区的居民主要是低收入人群。这些居民以租住为主，棚户区的土地本身并不归其所有。刚到城郊的新移民往往先用木板、纸板等临时材料搭建棚户。如果警察监管力度不大，棚户区居民往往就会趁机将原有的棚户改造成泥砖结构的固定建筑。政府一开始往往并不会给棚户区提供城区一样的基础设施。但随着棚户区的长期存在和棚户区居民经济条件的改善，土耳其政府往往会将棚户区改造成公寓区并将其逐渐纳入市政管辖范围。参见 Halil I. Tas and Dale R. Lightfoot, “Gecekondu Settlements in Turkey: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the Developing European Periphery,” *Journal of Geography*, vol. 104, no. 6, 2005, pp. 265—268; Tahire Erman and Aslyhan Eken, “The ‘Other of the Other’ and ‘unregulated Territories’ in the Urban Periphery: Gecekondu Violence in the 2000s with a Focus on the Esenler Case, Istanbul,” *Cities*, vol. 21, no. 1, 2004, p. 58.

“棚户区”有以下三个特点：(1) 违反建筑法律法规；(2) 在其他所有者的土地上建造；(3) 未经土地所有者同意而建造。^① 根据“Gecekondu”的字面含义和法律含义可见，该术语兼具“临时搭建”“结构简陋”和“违法建造”的多重内涵。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土耳其大规模的土改运动就导致部分乡村居民迁居城市，城市棚户区问题便开始初步显现出来。不过，当时的移民人数较少，土耳其政府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逐渐接受移民以棚户区这一方式解决自身的住房问题。到20世纪70年代时，多数新移民已经逐渐融入城市生活。^②

1983年开始，祖国党（土耳其语：Anavatan Partisi, ANAP）党首厄扎尔开始主政土耳其并推行影响深远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并使得土耳其的城镇化进程在20世纪80年代后空前加快，大量乡村居民移居城市边缘郊区并形成严重的棚户区问题。如表4所示，1960年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伊兹密尔三市的棚户区居民比例分别为45%、60%和34%，而到了1995年后，除安卡拉的这一比例没有变化外，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两市的这一比例不降反升至50%。20世纪末21世纪初，棚户区违建、违规租赁和其他违法违规现象都有增无减。据统计，截至2000年，土耳其约有1000万栋（约占全国总建成房屋的62%）房屋均属违章建筑，^③ 到2003年，土耳其全国仍然约有2000万人居住在棚户区。^④ 2011年，《晨报》（*Sabah*）在报道中称安卡拉、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等主要城市的棚户区比例仍然分别高达70%、60%—65%、50%左右。^⑤ 2016年时，来自伊兹密尔的正发党会议员内吉普·卡尔坎（Necip Kalkan）在其演讲中也仍然称伊兹密尔约有60%的住房为贫民窟。^⑥

① Murat Cemal Yalcintan and Adem Erdem Erbas, “Impacts of ‘Gecekondu’ on the Electoral Geography of Istanbul,”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vol. 64, 2003, pp. 97–98.

② Orhan Esen, “Istanbul’s Gecekondu,” 2009, <https://lsecities.net/media/objects/articles/istanbul-gecekondu/en-gb/>.

③ Bilge Armatlı Köroğlu and Özge Yalçiner Ercoşkun, “Urban Transformation: A Case Study on 7 Çukurambar, Ankara,” *Gazi University Journal Of Science*, vol. 19, no. 3, 2006, p. 175

④ Ayşe Bugra, “The Immoral Economy of Housing in Turke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 22, no. 2, 1998, p. 307.

⑤ “Türkiye’de 4 Milyon Gecekondu Var!” 2011, *Sabah*. <http://www.sabah.com.tr/ekonomi/2011/11/07/turkiyede-4-milyon-gecekondu-var>.

⑥ “İzmir’in Yüzde 60’ı Gecekondu (伊兹密尔60%的住房是贫民窟),” 2016, <http://www.gazetem-izmir.com/izmirin-yuzde-60i-gecekondu/14672/>.

表 4 土耳其主要城市棚户区居民比例的变化

	1960 年	1995 年	2011 年
伊斯坦布尔	45%	50%	60%—65%
安卡拉	60%	60%	70%
伊兹密尔	34%	50%	60%—65%

资料来源: Halil I. Tas and Dale R. Lightfoot, “Gecekondu Settlements in Turkey: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the Developing European Periphery,” *Journal of Geography*, vol. 104, no. 6, 2005, p. 267; “Türkiye’de 4 Milyon Gecekondu Var!,” 2011, *Sabah*. <http://www.sabah.com.tr/ekonomi/2011/11/07/turkiyede-4-milyon-gecekondu-var>。

2. 城市人口、社会结构的变化

城镇化导致了城市青年失业人口的增加。据统计, 1988 年以来土耳其全国总人口平均失业率仅为 8.67% 左右, 但如果将 15—24 岁的青年人口单独作为考察对象就会发现, 该年龄段人口的平均失业率却高达 18.06%, 即约为全国总人口平均失业率的 2 倍以上。另外, 图 13 也清晰地显示, 青年失业率在 1992—1993 年、2000—2002 年以及 2008—2009 年这三个时间段有明显的增加。考虑到城镇人口本身的快速增长, 也就不难推算出城镇地区青年失业人口在这些时段的突增。

不少研究发现, 失业人口 (尤其是青年失业人口) 的增多与一国的政治秩序的稳定性高度相关: 即失业人口越多, 一国的政治秩序就越不稳定。^① 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由于人口增长控制不当, 增加的人口不断向人口密集度更高的城市集聚, 而城市的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却未能跟上青年人口增长的速度。在这种情况下, 失业的青年人口逐渐成为不少发展中国家社会动荡、政治危机甚至是内战的诱因。^② 土耳其的城镇化也最终导致大量失业青年向城市地区集聚。同样, 青年失业人口的高度集聚也给历届土耳其政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美国中央情报局 1984 年的研究报告就发现, 土耳其的动乱和暴力事件几乎全部集中在城市地区: 15—24 岁年龄段的男性则几乎直接导致了近 80% 的政治动乱。此外, 这个年龄段的男性也是土耳其宗教、劳工相关暴力和动乱事件的重要参与者。^③ 该报

① Therese F. Azeng and Thierry U. Yogo, *Youth Unemployment, Education and Political Instability: Evidence from Selected Developing Countries*, Tunis, Tunisia: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Working Paper.

② Ali Mohamad, “Youth Unemployment: A Global Security Challenge,”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2014, <http://hir.harvard.edu/article/?a=7296>.

③ *Turkey: Impact of Population Growth*, Washington, D. C.,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1984, p.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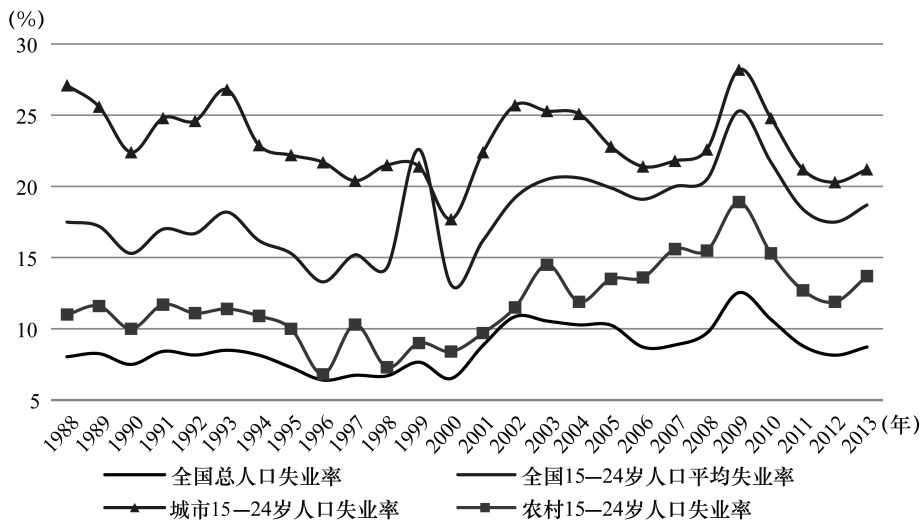


图 13 土耳其全国、城市及乡村 15—24 岁青年失业率趋势 (1988—2013 年)

注：其中，1988—1999 年数据仅有 4 月和 10 月份两组值。因此，这一时间段的数据均统一采用十月份的数据。其余数据皆为年度数据。另外，2014 年之后数据统计方式改变，故此处不作统一分析。

资料来源：Turkish Statistical Institute, *Regional Results Of Labour Force Statistics*, <http://www.turkstat.gov.tr/pretabloarama.do>。

告甚至预测称，在 20 世纪末前后，土耳其极有可能再度陷入军事政变、倒向极端伊斯兰主义等社会和政治危机。^①

后来的历史无疑验证了该报告的准确性。1990—1993 年，土耳其城市 15—24 岁青年人口的失业率从 22.4% 陡增至 26.8%。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伊斯兰背景的繁荣党（土耳其语：Refah Partisi, RP）迅速崛起。2000 年至 2001 年前后，土耳其出现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全国失业人口再次暴增，失业率也大幅增加。其中，城市 15—24 年龄段人口的失业率由 2000 年的 18% 陡增至 2002 年的 26%。危机爆发后，执政的三党联合政府力邀世界著名的土耳其裔经济学家凯末尔·德尔维希（Kemal Derviş）回国担任经济部长以应对危机。^② 但即便如此，

① Turkey: Impact of Population Growth, pp. 18 – 20.

② 土耳其 1999 年的全国议会选举选票分散，其中有六个党获得议会议席。在这种情形下，得票最多的民主左翼党（Demokratik Sol Parti, DSP）联合得票率第 2、第 4 的民族主义行动党（Milliyetçi Hareket Partisi, MHP）和祖国党（Anavatan Partisi, ANAP）组成三党联合政府以对抗得票率第 3 的政治伊斯兰政党美德党（Fazilet Partisi, FP）。此即所谓之“三党联合政府”。

该国的失业率到 2002 年年初仍没有有明显好转，三党联合政府只能被迫提前解散政府并举行全国议会选举。埃尔多安 2001 年组建的正发党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参与选举并以绝对优势胜选。赢得大选后的正发党政府部分继承了前政府经济部凯末尔·德尔维希的经济改革政策，在正发党及时而有效的治理下，土耳其的经济危机快速缓解并进而实现了高速增长。2008 年在美国首先爆发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主要经济体，土耳其经济也受到部分冲击，其城市失业率也随之从 2008 年的 23% 增长至 28%，创下自 1988 年以来最高失业率。与之前的失业危机类似，失业率在 2009 年后便再度快速降低至正常值。2011 年之后的连续数年，城市失业率甚至一度降到 1988 年以来（仅 2000 年除外）的最低值。可见，与三党联合政府不同，正发党分别有效应对了 2001 年前后和 2008 年之后的金融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失业人口危机。正是由于其出色的危机管控能力，正发党才能免于重蹈三党联合政府被迫下台的覆辙并不断赢得全国议会和地方选举。

此外，城镇化也逐渐改变了城市居民的家庭规模和经济状况。土耳其全国不同省份的平均家庭规模（Household size）明显不同。据统计，土耳其 2012 年平均家庭人口数为 3.7 人。就具体数据来看，西部发达省份和安卡拉省的平均家庭规模要远小于中部和东部省份。土耳其平均家庭规模最高的五个省份分别为东部地区的希纳克省、哈卡里省、穆希省、锡尔特省和凡城省，其平均每户人口数分别高达 7.9 人、7.4 人、6.6 人、6.5 人和 6.4 人。全国家庭规模最小的五个省份分别为西部地区的恰纳克卡莱省、巴勒克希尔省、埃斯基谢希尔、布尔杜尔省及穆拉省，其平均每户人口数仅为 2.8 人、2.9 人、2.9 人、3.0 人和 3.0 人，大致与葡萄牙等欧洲国家相同。^① 不过，由于平均家庭规模较大的中部和东部省份的移民大量迁居伊斯坦布尔、安卡拉等大城市后基本维持其家庭规模，这导致作为西部发达省份的伊斯坦布尔与安卡拉的平均家庭规模反而高于一般的发达省份。^② 比如，两省 2012 年的平均家庭规模分别为 3.2 人和 3.6 人。

许多数据显示，家庭规模几乎直接与家庭经济状况挂钩。土耳其政府的调研

① Turkish Statistical Institute, *Turkish Statistical Institute Statistics on Family 2012, 2013*, <http://www.turkstat.gov.tr/PreHaberBultenleri.do?id=13662>. 以及 Eurostat, *Household Composition Statistics-Statistics Explained*, http://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Household_composition_statistics. 具体数据请参见附录示意图。

② 棚户区居民的平均家庭人口数高于城市中产和上层阶级，但比起乡村地区则相对较少。

结果显示,约有60%的家庭人数等于或超过7人的家庭认为其收入“极难”(very difficult)抵消日常支出,家庭人数为1—2人和3—4人的家庭则分别仅有39.3%和41.9%持这种态度。^①伊斯坦布尔以及安卡拉等大城市的家庭规模也部分导致了居民经济状况的恶化,不少人(尤其是棚户区居民)在较小的年龄便开始从事摆摊、建筑、卖花等所谓的“非正式行业”(informal sector)。在极端情况下,甚至有不少人从事乞讨和犯罪活动。^②

3. 城镇化与社会问题(犯罪和暴力)的集聚

研究发现,棚户区居民普遍具有年轻化、受教育程度低、多从事非正式行业、失业率高和宗教成分浓厚等共同特点。^③正因为如此,棚户区往往是土耳其不少城市犯罪和暴力的策源地。早在20世纪60—70年代,棚户区就是不少暴力事件(尤其是对抗政府的暴力事件)的策源地。厄扎尔政府改革后,棚户区居民对政府的抵触状况有所缓解,但其内部以及棚户区与城区之间的矛盾却开始恶化。^④

早期,城市中产阶级或者中上阶层往往以“棚户区居民/乡下人”(Gecekondu)来代指刚从乡村迁来的棚户区居民。作为“Gecekondu”的衍生词,“Gecekondu”主要强调“来自棚户区”这一地理内涵,其主观倾向相对中立。然而,随着棚户区内部以及棚户区居民与城区之间暴力事件不断增多,城市居民对棚户区居民的印象逐渐恶化。以所谓的“加齐暴乱”(Gazi Mahallesi olayları)为例:1995年3月12日数名男子闯入伊斯坦布尔城郊加齐奥斯曼帕夏区(Gaziosmanpaşa)(今苏丹加齐区,sultangazi)的加齐社区(Gazi Mahalle)持枪袭击并杀死数名当地居民。这起刑事案件迅速演变为上万人游行示威的群众事件,游行示威活动一度从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的加齐奥斯曼区波及海峡东岸的云拉尼耶(Ümraniye)区,示威群众在两地均与警察发生激烈对抗。不久,安卡拉地区也爆发了类似的骚乱。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两地均出动大量警力和特种作

① Turkish Statistical Institute, *Turkish Statistical Institute Statistics on Family* 2012, 2013, <http://www.turkstat.gov.tr/prehaber-bultenleri.do?id=13662>.

② Halil I. Tas and Dale R. Lightfoot, “Gecekondu Settlements in Turkey: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the Developing European Periphery,” *Journal of Geography*, vol. 104, no. 6, 2005, p. 269.

③ Murat Cemal Yalcintan and Adem Erdem Erbas, “Impacts of ‘Gecekondu’ on the Electoral Geography of Istanbul,”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vol. 64, 2003, pp. 99—100.

④ Tahire Erman and Aslyhan Eken, “The ‘Other of the Other’ and ‘unregulated Territories’ in the Urban Periphery: Gecekondu Violence in the 2000s with a Focus on the Esenler Case, Istanbul,” *Cities*, vol. 21, no. 1, 2004, p. 58.

战部队方才平息骚乱。骚乱最终造成数十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抛开加齐暴乱爆发的具体原因不论，该事件逐渐导致土耳其媒体和城市精英从感情上越发疏远棚户区居民。在不少城市精英看来，棚户区居民是城市犯罪、恐怖和暴力事件的主要根源。棚户区的居民被贴上“法外之地的公民”（citizens of outlaw spaces）或者“伊斯坦布尔的‘其他’市民”（‘other’ citizens of Istanbul）等歧视性标签。

此外，20世纪90年代之后，土耳其大城市的不少精英开始从城市中心移居城郊。精英向郊外的移居使得原本地理隔绝的棚户区居民与城市精英有了更多的物理接触机会，城市精英对棚户区居民的印象进一步恶化。^①最终，“郊区人/郊区佬”（Varoşlu）一词应运而生。与“Gecekondu”不同，“Varoşlu”一词带有明显的负面和敌视内涵。^②一方面，主流媒体往往使用这个词来进行歧视性报道，而另一方面，那些亲伊斯兰的媒体往往仍然故意使用原来的 Gecekondu 一词来回避 Varoş 及其衍生词。^③对棚户区居民的称呼的变迁折射出主流社会与边缘社区之间隔阂的加深。

五 城镇化与伊斯兰政党的崛起

随着城镇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不断发酵，伊斯兰政党崛起的社会土壤也逐渐成形，再借助土耳其特有的议会选举制度，伊斯兰政党的崛起已然水到渠成。

（一）伊斯兰政党与城市的结合

首先，收入分配不均导致棚户区居民等边缘群体的剥夺感上升给伊斯兰政党提供了契机。与精英政党不同，伊斯兰政党往往猛烈地抨击市场原则，不断宣扬

① Neslihan Demirtaş and Seher Şen, “Varoş Identity: The Redefinition of Low Income Settlements in Turke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3, no. 1, 2007, p. 91.

② 在土耳其语中，“lu”是“来自……”的后缀。如上文所述，Gecekondu 表示“棚户区”，因此 Gecekondu 表示“来自棚户区的人”，即“棚户区居民”。Varoş 本身表示“郊区”。因此，Varoşlu 的原意为“来自郊区的人”或者“住郊区的人”。但在此处其意义已经发生变化。参见 Hakan Yücel, “Varoşun Üç Hali: ‘İç Varoş’, ‘Parçalanmış Varoş’ ve ‘Bütünleşik Varoş’ (Three States of Varoş: ‘Inner Varoş’, ‘Fragmented Varoş’ and ‘Integrated varoş’),” *Siyasal Bilimler Dergisi*, vol. 4, no. 1, 2016, p. 53; Tahire Erman and Aslyhan Eken, “The ‘Other of the Other’ and ‘Unregulated Territories’ in the Urban Periphery: Gecekondu Violence in the 2000s with a Focus on the Esenler Case, Istanbul,” *Cities*, vol. 21, no. 1, 2004, p. 59.

③ Neslihan Demirtaş and Seher Şen, “Varoş Identity: The Redefinition of Low Income Settlements in Turke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3, no. 1, 2007, p. 98.

社会正义；伊斯兰政党也更强调自身与棚户区居民和中低收入居民之间联系、鼓吹自身代表边缘群体、普通民众和多数人。

其次，凭借草根路径，伊斯兰政党将自身从意识形态层面与传统的主流精英型政党明确区分开来^①，“郊区”（Varoş）一词逐渐与“伊斯兰”联系起来。^②比如，正发党领袖埃尔多安就多次在其竞选演讲中提及自己来自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偏远郊区（卡森帕夏：Kasımpaşa）。此外，埃尔多安也毫不隐讳地宣称自己是“郊区孩子”（土耳其语：Varoş çocuğu）。^③如前所述，棚户区居民人口众多，棚户区选民所占全国选民的比例也极高。仅以2000年为例，土耳其全国棚户区的选民就多达514万选民，占全国总选举人口的17%左右。^④如此大的选民基础，无疑是声称代表棚户区居民等边缘群体的政党的巨大票仓。

（二）城镇化与议会选举中的“聚零为整”

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不仅为伊斯兰政党提供了合适的社会土壤，也令土耳其特殊的议会选举制度越来越有利于伊斯兰政党。在2017年4月公投之前，土耳其的政治制度是议会制。土耳其议会实行一院制，全称为“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土耳其语：Türkiye Büyük Millet Meclisi），议会一共550席，每4年选举一次，采用洪德法（d'Hondt method）计算各政党胜选的议席。^⑤议席根据以下原则分配：首先给全国81个省份分配一个席位以确保每省均最低有一个议席；其次，选举委员会根据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按比例分配剩余的469个席位。^⑥此外，根据土耳其宪法和选举法规定，按照人口比例分配的议会席位如果在19—36个省份

① Ş İlgü Özler, “Politics of the Gecekondu in Turkey: The Political Choices of Urban Squatters in National Elections,” *Turkish Studies*, vol. 1, no. 2, 2000, p. 53.

② Neslihan Demirtaş and Seher Şen, “Varoş Identity: The Redefinition of Low Income Settlements in Turke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3, no. 1, 2007, p. 98.

③ Neslihan Demirtaş and Seher Şen, “Varoş Identity: The Redefinition of Low Income Settlements in Turke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3, no. 1, 2007, p. 98.

④ Ş İlgü Özler, “Politics of the Gecekondu in Turkey: The Political Choices of Urban Squatters in National Elections,” *Turkish Studies*, vol. 1, no. 2, 2000, p. 40.

⑤ Carnegie Europe, *How Turkey's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Work*, <http://carnegieeurope.eu/2015/10/26/how-turkey-s-parliamentary-elections-work-pub-61744>.

⑥ 类比来看，土耳其一院制的议会实际上同时需要充当美国参众两院的功能：既要充当美国参议院代表各个州的职责，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无论人口多少均给予所有省份以最低限度的议席；充当众议院的功能，即需要根据人口多少来按比例分配议席。参见 Türkiye Büyük Millet Meclisi,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and Rules of Procedure of the Grand National Assembly of Turkey*, <https://global.tbmm.gov.tr/index.php/en/yd/>。

必须拆分为两个选区，如果超过 36 席则需要拆分为 3 个选区。比如伊斯坦布尔省议会席位为 88 个，故被拆分为 3 个选区；安卡拉和伊兹密尔的议会议席分别为 32 个和 26 个，故二者分别被拆分为两个选区。其余 78 省的议席总数皆低于 19 个，故各自独立成为一个选区。因此，土耳其全国 81 各省份最终被划分为 85 个选区。按规定，参选政党必须获得全国 10% 以上的选票才能获得议席。若某政党参选但未能达到该标准，其所获得的议席将自动分配给达到这一门槛的其他政党。由于总议席数为 550 个，政党只需赢得 276 个简单多数议席即可单独组建政府。^① 显然，根据该选举办法，全国性、大型政党往往比地区性、中小型政党更具优势。^②

由于这种特殊的选举制度，各省获得一个议席平均所需的登记选民数量浮动极大。巴伊布尔特省和伊兹密尔省分别是平均所需登记选民人数最少和最多的省份。如表 5 所示，巴伊布尔特省由于人口稀少，全省仅分得 2 个议会席位。这意味着在 2002 年的全国选举中，单个议会席位在该省所能代表的选民是 27384 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单个议会席位在 2015 年 11 月的选举中则仅能代表 26349 个选民。作为全国人口第三大省市，伊兹密尔省在 2002 年时便总计拥有 24 个议席，单个议席在该省所代表的选民人数为 100970 人，到了 2015 年 11 月选举时，单个席位所代表的人数更是增长至 119471 人。除伊兹密尔以外，伊斯坦布尔、安卡拉等大省单个议席所能代表的选民人数也接近 10 万人，即为最少的巴伊布尔特省的 4—5 倍。简言之，伊斯坦布尔、安卡拉等人口大省选民的代表性远远不及那些人口稀少的省份。^③

表 5 土耳其不同省份议会席位代表性的差异

省份	2002 年			2007 年		
	登记选民	议席	单个议席所代表的选民数	登记选民	议席	单个议席所代表的选民数
伊斯坦布尔	7159151	70	102273	7406297	69	107337
安卡拉	2698870	29	93064	2920818	29	100717

① “The Aftermath of Turkey’s Elections: The Curse of d’Hondt,” *The Century Foundation*, 2015, <https://tcf.org/content/commentary/the-aftermath-of-turkeys-elections-the-curse-of-dhondt/>.

② Andrew Finkel, “Of the D’Hondt Method with a Barrier,”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latitude.blogs.nytimes.com/2013/07/12/of-the-dhondt-method-with-a-barrier/>.

③ The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 *Republic of Turkey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7 June 2015: OSCE/ODIHR Limited Election Observation Mission Final Report*, p. 6.

续表

省份	2002 年			2007 年		
	登记选民	议席	单个议席所代表的选民数	登记选民	议席	单个议席所代表的选民数
伊兹密尔	2423285	24	100970	2528035	24	105334
阿尔达汉	78544	2	39272	68828	2	34414
巴伊布尔特	54768	2	27384	53470	2	26735
省份	2011 年			2015 年 11 月		
	登记选民	议席	单个议席所代表的选民数	登记选民	议席	单个议席所代表的选民数
伊斯坦布尔	9397323	85	110556	10318203	88	117252
安卡拉	3409758	31	109992	3745706	32	117053
伊兹密尔	2906224	26	111777	3106250	26	119471
阿尔达汉	69160	2	34580	68865	2	34432
巴伊布尔特	50079	2	25039	52698	2	26349

注：表格数据皆由笔者计算所得。其中，由于人数不能为零数，故未能除尽的数字皆直接取整数，未四舍五入。

资料来源：Manuel Álvarez-Rivera, “*Election Resources on the Internet: Elections to the Turkish Grand National Assembly*,” <http://www.electionresources.org/tr/>。

根据以上数据也不难发现，2002年至2015年间，单个议席在巴伊布尔特、阿尔达汉等人口稀少的省份所能代表的选民人数整体呈下降趋势，与之相反，单个议席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等人口大省所能代表的选民人数却不断增长。这意味着，单个议席代表性不均衡的状况在过去的十几年间还有持续恶化的趋势。与此同时也不难发现，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等人口大省的注册选民和议会席位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持续增长。这表明，尽管各省的议席数会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结果而实时调整，但这种调整的速度和幅度远远跟不上人口大省的人口和注册选民的增速。

人口大省和人口稀少的省份的这种不均衡也直接作用于历次大选的结果。首先，人口稀少省份本身议席数极少，这意味着一个政党无论是获得该省100%的选票还是获得较少的30%的选票，其在该省最终能够赢得的议席数几乎没有差别。在这种情况下政党在广大的人口稀少的省份争取更多议席的空间极小。对于那些占绝对优势地位的政党而言，其支持者的不少选票实际上并没有任何意义。人口大省的选举状况则恰好相反。同样以人口最多的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为例，这三个省份的议席数分别高达数十席，在这种情形下，得票率的细微

不同就可能造成最终赢得的议席数的大幅浮动。换言之，如果一个政党能够凭借较高的得票率而在人口大省的选举中占优势，那么其能争取到的议席优势就更显著。

可见，对于一个全国性的政党而言，一方面，其在广大人口稀少的省份的支持者的选票存在大量浪费的可能，另一方面，其在人口大省要赢得单个席位所需的选票又远超其在人口稀少省份所需的选票，且在人口大省获得更大议席优势又是在全国选举中获得选举优势的绝对前提。那么，如果能将其在人口稀少省份的多余选民转移并集中到人口大省来，该政党支持者的选票的功效将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其在全国范围内获得选举优势的可能性也势必显著增大。

很巧的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正是中西部人口稀少省份的乡村居民不断向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等人口大省的迁徙有效地强化了伊斯兰政党在全国范围内的选举优势。土耳其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安纳托利亚地区和库尔德人地区）虽然地域广阔、省份众多，但其人口分布极其稀少。尽管这些省份的人口增长率相对更快，但由于人口基数小且人口分散，各省每 4 年的人口增量尚不足以导致其议席数量的大幅变化。而大规模的城镇化则导致了原本分散于众多的中西部省份的乡村居民集中迁居至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等省（城市）。如前文所证明过的那样，广大的中西部省份居民普遍人均收入较低，且相对更加倾向伊斯兰政党。那么，大量倾向支持伊斯兰政党的新移民的到来和扎根使得原本可能在中西部省份浪费掉的选票在人口大省的选举中起到了实质性作用。换言之，城镇化所带来的大量乡村居民向伊斯坦布尔等大城市的迁移也因土耳其的选举制度的特殊性而强化了伊斯兰政党的选举优势。形象地讲，这种情形恰是土耳其议会选举中的“聚零为整”。

（三）20 世纪末以来土耳其伊斯兰政党的崛起

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导致了伊斯兰政党在城镇地区的落地生根，特殊的选举制度也因城镇化而对伊斯兰政党越来越有利，伊斯兰政党的崛起已经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正是凭借棚户区居民和中低收入居民的强力支持，伊斯兰背景的政党开始逐渐崛起。比如，自 1987 年以来，先后有繁荣党、美德党以及正发党等具有伊斯兰背景的政党角逐土耳其大选。其中，繁荣党、美德党先后参加四次全国大选，繁荣党经过三次选举便从土耳其第五大政党跃居为第一大政党。在繁荣党被解散后，美德党曾于 1999 年短暂参加选举并成为议会第三大党，参见表 6。

表6 1987年至2002年间土耳其伊斯兰背景政党得票率演变^①

政党	选举时间	得票率(%)	政党排名	大国民议会议员人数	
				该党	总计
繁荣党	1987	7.2	第5	—— ^②	450
繁荣党	1991	16.9	第4	62	450
繁荣党	1995	21.4	第1	158	550
美德党	1999	15.4	第3	111	550
正发党	2002	34.3	第1	363	550

资料来源: Arda Can Kumbaracıbasi, *Turkish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the AKP: Dilemmas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Leadership Strategy*, Routledge, 2009, p. 92。

2002年,以埃尔多安为首的正发党同样以争取边缘选民的竞选策略以大幅优势赢得土耳其全国议会选举。正发党赢得选举后,土耳其主流媒体《晨报》(土耳其语: *Sabah*) 使用“安纳托利亚人的入侵”(anatolian invasion) 的说法戏称该党在伊斯坦布尔的压倒性胜利。由于棚户区居民多数从安纳托利亚地区移民而来,《晨报》的措辞显然意在暗示正发党利用被边缘化的棚户区居民赢得大选的竞选策略。^③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正发党等伊斯兰背景政党的核心成员往往也来自广义上的“安纳托利亚地区”或者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等大城市的棚户区。此处仅以正发党为例,如文末关于正发党创始成员的附录所示,正发党一共有60位创始成员,其中仅有数位成员籍贯为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其余80%左右的成员均来自里泽省、特拉布宗省、埃尔祖鲁姆省等土耳其中东部省份或者西部省份的偏远地区。此外,正发党现任的核心成员结构也依然呈现相似特征。^④

如上所述,一方面,伊斯兰背景的政党凭借“安纳托利亚地区”等土耳其

① RP的土耳其语为: Refah Partisi, 即“繁荣党”。FP的土耳其语为: Fazilet Partisi, 即“美德党”。

② 由于得票率未超过10%, 故未实际获得议会席位。

③ Neslihan Demirtaş 和 Seher Şen, “Varoş Identity: The Redefinition of Low Income Settlements in Turke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3, no. 1, 2007, pp. 96–97.

④ 此处不再详述, 具体可见正发党官网: <https://www.akparti.org.tr/english/yonetim/baskanliklar>。以及文末附录。

中东部省份和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科贾埃利等大城市棚户区居民的选民基础赢得选举；另一方面，伊斯兰背景的政党本身的核心组织人员同样主要来自所谓的“安纳托利亚地区”。换言之，伊斯兰背景的政党的胜利可谓是彻头彻尾的“安纳托利亚人入侵”。

另外，正发党上台后开始就棚户区问题和其他中低收入人群所面临的问题出台了针对性的政策。就住房问题而言，正发党重组了厄扎尔政府建立的民众住房管理局。重组后的住房管理局负责总揽之前移民住房协调办公室（Immigrant Houses Coordination Office）、国土资源办公室（National Land Office）等诸多与住房相关的职能部门的职责并有权通过翻新、改造和开发等方式为中低收入人群提供住房。针对城市棚户区问题，管理局专门推出了所谓的“城市改造计划”（Urban Transformation Projects）以整治“病态的、丑陋的城镇化”（Unhealthy and ugly urbanization）。^①

按照规定，管理局在建造和改造后一共为中低收入人群提供价位不等的四类住房。其中，价格最低的一档住房，只要家庭月收入在3200土耳其里拉以下（伊斯坦布尔市市民需不超过3700里拉）均可申请。通过申请的居民只需向管理局按时支付一定的租金或者按揭贷款，直到付清所有按揭款项后管理局才正式授予居住者住房产权。据官方统计，该管理局在1984年至2002年的19年间仅仅建造了43145套住房，而在正发党的第一届政府任期内（2002—2007年），就建造了25万套住房，到正发党的第二届政府任期（2007—2011年）结束时，该管理局已经累计建造了50万套住房。^②换言之，正发党在其执政的前十年间为中低收入民众提供的住房约为土耳其政府在1984年至2002年近20年时间的10倍。恰如该管理局的背景资料所言，正发党执政后的民众住房管理局实现了所谓的“有序城市化与住房的跃进”（planned urbanization and housing leap）。

针对性政策的出台和执行无疑进一步巩固了正发党的执政地位。自2002年以来，正发党连续四次赢得全国议会选举和一次总统选举以及一次全民公投，显示其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空前的支持。首先，除了长期支持库尔德民族主义政党的东南诸省以外，其他经济条件较差的中西部省份大部分成为伊斯兰政党的坚定票仓。其次，包括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科贾埃利等经济收入极高的大城市对

① Helin Özge Burkay, *Social Policy of Urban Transformation: Social Housing Policies in Turkey from the 1980s to Present*, Master of Arts degree, The Atatürk Institute for the Modern Turkish History, Boğaziçi University, 2006, p. 2.

② “Background,” *Toplu Konut İdaresi Başkanlığı*, <https://www.toki.gov.tr/en/background.html>.

伊斯兰背景政党的支持度也高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的省份。另外，最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是那些传统上属于共人党坚定票仓的省份也有逐年倒向伊斯兰政党的趋势。

以伊兹密尔为例，该省份处地中海沿岸，为全国人口第三大省，居民收入常年位居全国前列，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历届选举中是共和人民党（CHP）的坚定票仓。如图14所示，2002年全国议会选举时，正发党在伊兹密尔两个选区的得票率分别仅为17.7%和16.7%，而到了2011年，正发党在两个选区的得票率已经分别高达37.1%和36.5%。在2015年11月的全国议会选举中，民族行动党（MHP）和人民民主党（HDP）参选并在全国范围内突破了10%的门槛。在这种情况下，正发党在伊兹密尔的选票被分散，得票率也有小幅跌落。^①但即便如此，正发党在伊兹密尔两个选区的得票率仍然高达30%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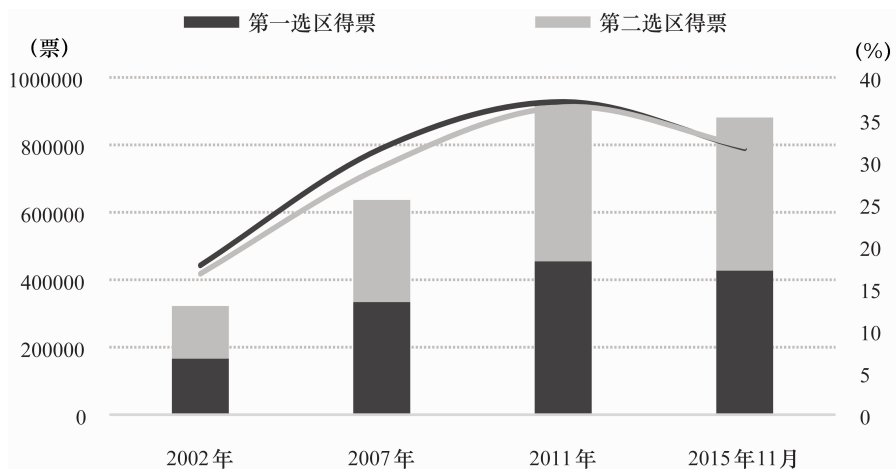


图14 正发党在伊兹密尔两个选区自2002年以来历次选举中的表现

注：得票数据为左轴，得票率数据为右轴。

资料来源：Manuel Álvarez-Rivera, “Election Resources on the Internet: Elections to the Turkish Grand National Assembly,” <http://www.electionresources.org/tr/>。

综上所述，伊斯兰政党（包括正发党在内）在过去的30余年间的崛起有以下明显特征：是城乡一体式的崛起而非仅在乡村崛起；是根植于人口和社会结构

^① 如上所述，根据选举法规定，一个政党只要能在全国范围内突破10%的选票的门槛，其在各个选区所获得选票将根据洪德法分配议席。反之，其在各选区所获选票将自动分配给突破这一门槛的政党。

这一深层根源而非仅仅与宗教相关；除库尔德人聚居省份外，伊斯兰背景的政党的崛起是全国性的而非地域性的。

六 案例：伊斯坦布尔与伊斯兰政党的崛起

为了从更微观的角度来审视土耳其伊斯兰政党的崛起，本文还将以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为案例来透析本文的核心观点。

伊斯坦布尔原名“君士坦丁堡”或“拜占庭”，是拜占庭帝国旧都。^① 奥斯曼帝国征服该城市后遂定都于此，并更名为伊斯坦布尔。在数百年的历史中，伊斯坦布尔一直是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人口早在 18、19 世纪末便达到数百万。当时的法国皇帝拿破仑曾说如果全世界是一个统一的国度，那么伊斯坦布尔应是其首都。^② 坦志麦特改革（土耳其语：Tanzimat）后，伊斯坦布尔地区开始引进近代城市管理制度。1855 年左右，帝国政府任命第一位伊斯坦布尔市长（şehremini）以管理整个伊斯坦布尔市（İstanbul şehreminliği）——即整个伊斯坦布尔地区。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新政府决定与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切割并有意迁都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安卡拉省。新都安卡拉代表了新政府的决心和风貌，政治、经济资源不断向该地倾斜。与新都相对，伊斯坦布尔被视为奥斯曼帝国的象征，政治地位风光不再，经济发展和投资也一度受限。^③ 1930 年，新政府在帝国时期的“伊斯坦布尔市”的基础上将该地区重新划分为 10 个区（土耳其语：ilçe）进行管理。1957 年后，伊斯坦布尔省（İstanbul ili）和伊斯坦布尔市（İstanbul Belediyesi）曾长期分开办公。1982 年开始，伊斯坦布尔与安卡拉、伊兹密尔一起根据该国《大都市区管理法案 3030》正式成立“伊斯坦布尔大都会区”（土耳其语：İstanbul Büyükşehir Belediyesi；英语：Istanbul Metropolitan Municipality）。2005 年后，伊斯坦布尔市与伊斯坦布尔省合并，二者边界统一。2012 年后，土耳其政府通过《6360 法案》，根据该法案，伊斯坦布尔地区所有居民一律划为城市居民。至此，伊斯坦布尔省与伊斯坦布尔市完全重叠，部分伊斯

① 据官方资料称，伊斯坦布尔地区有 3000 年的建城史和 1600 年的建都史。参见 İstanbul Büyükşehir Belediye, *Strategic Plan: 2015–2019*, p. 40.

② “The Lure of the city: Turkey’s Urban Centres Are Modernising at the Double,” *The Economist*, 2016, <https://www.economist.com/news/special-report/21689875-turkeys-urban-centres-are-modernising-double-lure-city>.

③ Murat Cemal Yalcintan and Adem Erdem Erbas, “Impacts of ‘Gecekondu’ on the Electoral Geography of Istanbul,”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vol. 64, 2003, p. 92.

坦布尔省的行政组织被撤销,市政府统摄一切省辖范围内的基层行政事务。^①

(一) 伊斯坦布尔人口和城区的扩张

受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乱和共和国迁都的影响,伊斯坦布尔的人口在1927年已经下降至80.69万人。此外,在共和国成立之初直到50年代末,新政府为了促使各区域均衡发展有意限制人口向伊斯坦布尔等大城市自由迁移。^②这一时期,伊斯坦布尔的人口绝大多数均为本地居民,人口基本皆为内生性增长且增速缓慢。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国主导的马歇尔计划正式进入欧洲。作为北约一员的土耳其也从中获得部分援助。土耳其在这一时期从西方引进了农用拖拉机并在国内大规模普及。农用拖拉机等农业器械和技术的普及使得大量的乡村劳动力解放出来,乡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因此,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末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逐步放开对国内人口迁徙的限制。^③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伊斯坦布尔理所当然地成为绝大多数农业人口的迁徙目的地,其人口从这一时期开始持续增长。到1980年时,伊斯坦布尔人口已达390余万人。

此后,土耳其经济改革开始拉开序幕,国家经济发展开始转向外向型的进口替代战略,伊斯坦布尔作为全国经济中心和工业中心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据统计,土耳其20世纪50年代初步工业化的时候,伊斯坦布尔的轻小工业和重工业分别占土耳其全国总量的19%和40.8%,而到了经济改革后的1985年时,其轻小工业和重工业占全国的比重已经增加到21%和44.9%。^④伊斯坦布尔经济和工业的空前发展对外来移民的吸引力也空前增强。如图16所示,该地区1970—1980年的十年间人口增长仅约为90万人,而在1980—1985年的短短五年间,其人口就增加了85万人。尤其在1995—2000年的五年间,其人口更是空前地增加了270万人。从1980—2000年的20年间,伊斯坦布尔人口猛增数倍至1000

① İstanbul Büyükşehir Belediye, *Strategic Plan: 2015–2019*, pp. 2–3; Mürsel Yakar, “Municipalities in Turkey,” *Union of Municipalities of Turkey (Türkiye Belediyeler Birliği)*, <http://www.tbb.gov.tr/en/local-authorities/municipalities-in-turkey/>.

② Murat Cemal Yalcintan and Adem Erdem Erbas, “Impacts of ‘Gecekondu’ on the Electoral Geography of Istanbul,”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vol. 64, 2003, p. 92.

③ Murat Cemal Yalcintan and Adem Erdem Erbas, “Impacts of ‘Gecekondu’ on the Electoral Geography of Istanbul,”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vol. 64, 2003, p. 93.

④ Helin Özge Burkay, *Social Policy of Urban Transformation: Social Housing Policies in Turkey from the 1980s to Present*, Master of Arts degree, The Atatürk Institute for the Modern Turkish History, Boğaziçi University, 2006, p. 58.

万人。截至 2014 年，该省的总人口已达 1437 万人。

此外，随着伊斯坦布尔人口总量的增长，其人口占土耳其全国人口的比例也不断攀升。如图 15 所示，1927 年时，伊斯坦布尔人口仅占土耳其全国人口的 6.11%，到了 2014 年的时候，这一比例已经高达 18.5%。换言之，土耳其全国约有 1/5 的人口居住在伊斯坦布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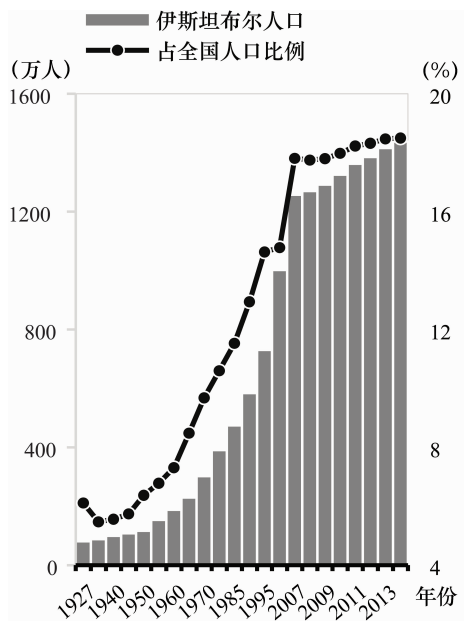


图 15 伊斯坦布尔人口变迁

资料来源：Turkish Statistical System and Turkstat Istanbul Regional Office, *Study Visit of the UNSD, ESCAP and OSCE to Turkey*, Istanbul, 2015, p. 34。

表 7 伊斯坦布尔 1990—2013 年间城区面积变化数据

年份	面积 (万公顷)	时间段	年均增长率 (%)
1990	4.6928	—	—
2002	8.7126	1990—2002	5.3
2013	13.1606	2002—2013	3.7

注：笔者制表。

资料来源：The Atlas of Urban Expansion, Istanbul, <http://atlasofurbanexpansion.org/cities/view/Istanbu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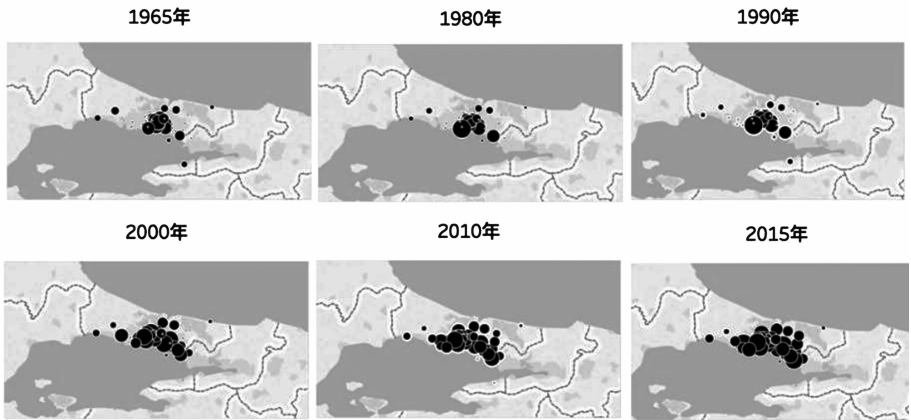


图 16 伊斯坦布尔各区人口增长情况

注：随着自身人口的自然增长和外来移民的不断增长，伊斯坦布尔市区也开始逐渐扩大。如图 16 所示，自 1965 年以来，伊斯坦布尔市区面积不断向博斯普鲁斯海峡东西两岸扩展。20 世纪 80 年代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后，伊斯坦布尔市区面积更是空前扩大。联合国数据显示，1990 年伊斯坦布尔市区建成面积 (urban extent) 约为 4.6928 万公顷，到 2002 年时，其市区面积已经增长近一倍达到 8.7126 万公顷，2013 年时，伊斯坦布尔市区面积更是再度增长至 13.1606 万公顷。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土耳其统计局数据绘制。

从建成市区 (ilçe) 来看，伊斯坦布尔在共和国政府建立之前仅有阿达拉西 (Adalar)、巴克乐克依 (Bakırköy) 和席勒 (Şile) 3 个老城区。从共和国政府成立后到 20 世纪 50 年代之间，伊斯坦布尔又新增了包括贝伊欧麓 (Beyoğlu)、恰塔乐嘉 (Çatalca) 等 11 个市区。在 20 世纪 40—80 年代的 40 年间，伊斯坦布尔的市区则仅仅新增了包括西西里 (Şişli) 等在内的 3 个。时间进入 80 年代后，伊斯坦布尔市区增加的速度明显加快。其中，仅 1987—1993 年的 6 年间，伊斯坦布尔就新增了包括布玉克切克梅杰 (Büyükçekmece)、库曲克切克梅杰 (Küçükçekmece) 等在内的 13 个市区。2008 年后，该市再度设立包括阿塔谢希尔 (Ataşehir)、巴夏克谢希尔 (Başakşehir) 在内的 8 个新区，参见表 8。

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的各区均密布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仅有席勒、恰塔乐嘉等 3 个区为原离市中心的乡村飞地。50 年代至 70 年代末，土耳其实现了部分的工业化，有部分移民随之迁入伊斯坦布尔郊区地带，最后逐步形成这一时期建成的西西里 (Şişli)、热伊汀布尔努 (Zeytinburnu) 和加齐奥斯曼帕夏 (Gazi-osmanpaşa) 3 个市区。整体来看，80 年代之前的伊斯坦布尔的建城速度较慢，

其城区的扩大也主要沿着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延伸。从 80 年代开始，土耳其全国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开始，大量来自中西部的乡村居民迁入伊斯坦布尔的郊区。诸如埃森雷希（Esenler）、苏丹加齐（Sultangazi）、布玉克切克梅杰、库曲克切克梅杰等区均成为新移民的聚居区。

由于新移民的不断到来，再加上受定居郊区的新移民生育率高、家庭规模大等因素的影响，郊区人口暴增。为了管理这些新增人口，伊斯坦布尔市政府只能将原属于郊区的乡（Köy）、镇（Belde）升格为街道（Mahalle）和市区（İlçe）。2008 年以后，原本属于郊区的新建成市区已多达 13 个，其人口规模则在 2008 年达到 798 万人左右，而且由于其人口结构的特性，到 2015 年时，其人口更是增长至 980 万人左右。与之相反，所有老城区的人口总和远低于新建城区的人口，再加上这些老城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更低、人口规模更小等人口结构特征，老城区人口从 2008 年到 2015 年间仅仅增加 10 余万人。不难发现，其人口规模和人口增速已经远不可与新城区相提并论。

表 8 伊斯坦布尔各区建区时间及其基本概况

序号	区（İlçe）	建区时间（Kuruluş Tarihi）	类型	2008 年人口	2015 年人口
1	Adalar	1923 年前	老城区	14072	15623
2	Bakırköy	1923 年前	老城区	214810	223248
3	Şile	1923 年前	老城区	28571	33477
4	Beyoğlu	1926 年	老城区	245064	242250
5	Çatalca	1926 年	老城区	62339	67329
6	Üsküdar	1926 年	老城区	524889	540617
7	Beykoz	1928 年	老城区	243454	249727
8	Kartal	1928 年	老城区	426748	457552
9	Silivri	1928 年	老城区	124601	165084
10	Beşiktaş	1930 年	老城区	185373	190033
11	Fatih	1930 年	老城区	443955	419345
12	Kadıköy	1930 年	老城区	533452	465954
13	Sarıyer	1930 年	老城区	277372	344159
14	Eyüp	1936 年	老城区	323038	375409
小计	14 个区			3647738	3789807
15	Şişli	1954 年	交界区	312666	274017

续表

序号	区 (İlçe)	建区时间 (Kuruluş Tarihi)	类型	2008 年人口	2015 年人口
16	Zeytinburnu	1957 年	交界区	288058	289685
17	Gaziosmanpaşa	1963 年	交界区	460675	501546
小计	3 个区			1061399	1065248
18	Büyükdçekmece	1987 年	原郊区	163140	231064
19	Kâğıthane	1987 年	原郊区	415130	437942
20	Küçükçekmece	1987 年	原郊区	669081	761064
21	Pendik	1987 年	原郊区	541619	681736
22	Ümraniye	1987 年	原郊区	553935	688347
23	Bayrampaşa	1990 年	原郊区	268276	272374
24	Avcılar	1992 年	原郊区	333944	425228
25	Bağcılar	1992 年	原郊区	720819	757162
26	Bahçelievler	1992 年	原郊区	571683	602040
27	Güngören	1992 年	原郊区	314271	302066
28	Maltepe	1992 年	原郊区	417605	487337
29	Sultanbeyli	1992 年	原郊区	282026	321730
30	Tuzla	1992 年	原郊区	170453	234372
31	Esenler	1993 年	原郊区	464557	459983
32	Arnavutköy	2008 年	原郊区	163510	236222
33	Ataşehir	2008 年	原郊区	351046	419368
34	Başakşehir	2008 年	原郊区	207542	353311
35	Beylikdüzü	2008 年	郊区	185633	279999
36	Çekmeköy	2008 年	原郊区	147352	231818
37	Esenyurt	2008 年	原郊区	373017	742810
38	Sancaktepe	2008 年	原郊区	229093	354882
39	Sultangazi	2008 年	原郊区	444295	521524
小计	22 个区	—	—	7988027	9802379
总计	39 个区	—	—	12697164	14657434

资料来源: Türkiye Cumhuriyeti İçişleri Bakanlığı (土耳其共和国内政部长), *İl ve İlçe Kuruluş Tarihleri* (全国各省与各区的历史), 2013, <http://illeridareleri.gov.tr/il-ve-ilce-kurulus-tarihleri>, pp. 42 – 43; Murat Cemal Yalcintan and Adem Erdem Erbas, “Impacts of ‘Gecekondu’ on the Electoral Geography of Istanbul”,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vol. 64, 2003, pp. 91 – 111.

（二）城市扩张与社会矛盾激化

如上所述，伊斯坦布尔在共和国政府建立后人口和建成面积都不断扩张。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自由化改革后，这一趋势空前加速。伊斯坦布尔自身人口的内生性增长和外来移民的外生性人口增长使得城市基础设施、就业机会等均不能满足城市发展的需求。外来移民的集聚逐渐造成棚户区、高失业率等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治安问题。

第一，新移民的涌入和集聚使得伊斯坦布尔老城区（核心城区）周围形成了大量的棚户区。在新移民大量涌入之前，伊斯坦布尔老城区附近的郊区曾是老城区居民休闲度假甚至是置业的热门目的地。以巴赫切利埃弗雷希（Bahçelievler）为例，“巴赫切利埃弗雷希”的字面意思即“很多带花园的房子”。^① 该区在80年代以前原本以豪华住房区为主，该区也因此得名。随着80年代后的经济快速发展，大量移民迁入，原有城建环境被打乱，所谓的“带花园的房子”已名不副实。与巴赫切利埃弗雷希一样，伊斯坦布尔的多数郊区最终逐渐沦为棚户区。

第二，如前所述，伊斯坦布尔市区的人口在经济自由化改革以后急速增长。但与此同时，该市的棚户区占整个城区的比例却由1960年的45%增长至1995年的50%。此后，土耳其中央政府和伊斯坦布尔地方政府均曾在不同程度上改造和翻新棚户区。棚户区的不断翻新和重现以及央地统计部门的不协调使得棚户区占比的具体数据极为模糊。仅从已知的数据来看，该市的名义上的棚户区居民或者实际上的棚户区居民仍不在少数。以2000年为例，土耳其统计局和伊斯坦布尔市当地政府的数据分别显示，伊斯坦布尔约有88.60万栋或者107.08万栋建筑物属于所谓的“棚户”。^② 即便以全国人均3.3人的家庭规模计算，伊斯坦布尔2000年度也有292万—353万人居住在“棚户”里。^③ 根据前文提及的《晨报》（*Sabah*）的数据，即便是2011年时，伊斯坦布尔仍有60%—65%的人居住在“棚户”中。如果此数据为真，这意味着2011年该市尚有817万—885万的市民居住在棚户中。^④

① 在土耳其语中，Bahçe意为“花园”，Bahçeli意为“有花园的”；ev表示“房子、家”，ler是名词复数后缀。因此，Bahçelievler连写即“很多带花园的房子”。

② Ahmet Ozenc, “Istanbul: Impacts of Immigration on a Contemporary City,” *Laurea Magistrale / Specialistica. Politecnico di Milan*, 2013, p. 36.

③ 实际上，棚户区居民的家庭规模高于全国平均家庭规模。

④ 该年度伊斯坦布尔人总人口约为1362万人。

埃尔多安就自称来自伊斯坦布尔的“郊区孩子”。的确,埃尔多安父亲来自土耳其东北部黑海沿岸的里泽省(Rize)的居乃苏(土耳其语:Güneysu)。埃尔多安在13岁时随父迁居伊斯坦布尔的卡森帕夏。一方面,埃尔多安的原生家庭来自极为保守的里泽省,其父本人亦是保守的穆斯林。另一方面,卡森帕夏虽然在帝国时期是土耳其的重要工业化基地之一,但到了埃尔多安童年时期,卡森帕夏早已成为伊斯坦布尔污染最严重的市区之一。随着卡森帕夏的衰落和1960年左右政府放宽公民向大城市迁徙的限制,来自中部和东部省份的移民开始不断在此聚居。埃尔多安的家庭正是在这一时期迁居卡森帕夏。为了补贴家用,埃尔多安小时候曾经常与其母亲一起在卡森帕夏的街道上贩售零食。^①由此可见,埃尔多安的个人人生轨迹的确是一个典型的“郊区孩子”,而其家庭则是城市精英眼中典型的“乡下人”(Gecekondu)或者说更具歧视性的“郊区佬”(Varoşlu)。

需要注意的是,埃尔多安时代的“郊区孩子”与本文考察时间段的“郊区孩子”略有不同。埃尔多安父亲艾哈迈德·埃尔多安(Ahmet Erdoğan)是20世纪60年代左右迁居伊斯坦布尔的,之前其父曾在土耳其海岸警卫队(土耳其语:Sahil Güvenlik Komutanlığı)中服役,退役后成为一名水手和船长。简言之,埃尔多安的父亲虽然来自偏远的里泽省,但其仍然掌握某种职业技能。与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的移民不同,自由化改革后迁居伊斯坦布尔的新移民多为乡村居民,就业能力偏低。20世纪80年代以后迁至伊斯坦布尔的棚户区居民面临更严峻的就业、收入困难,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郊区孩子”也面临比埃尔多安时代更严峻的“棚户区问题代际遗传”。

第三,棚户区的增多造成了大量的城市治安问题。埃森雷希(Esenler)是伊斯坦布尔欧洲部分的一个市区。该区在1970年以前仅仅是一个村庄。在十余年间,乡村居民大量迁居该地,该地人口随之暴增至35万人。为了便于管理,伊斯坦布尔随即在1993年将该地升格为“市区”。设区后的埃森雷希一共分为17个街道。该区居民各自以籍贯为基础而分别聚居。与多数棚户区一样,埃森雷希也广泛存在各种地域、宗教、房屋、经济和劳务纠纷。比如,居住在该区的吉卜赛人^②就时常与附近的锡尔特人发生争执。吉卜赛人经济地位低下,处于该区的最底层,多数人从事拾荒等职业,而来自东部的锡尔特人

^① Soner Cagaptay, *The New Sultan: Erdogan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 Turkey*. I. B. Tauris (Kindle Edition), 2017, pp. 47-55.

^② 土耳其人称吉卜赛人为“罗马人”(Romans)。

则多从事小摊贩、劳动力服务等职业，经济状况稍好。两个毗邻的群体长期敌视，一方如果不慎越界进入另一方的街区即往往引发冲突。2002年3月2日至3日，埃森雷希的一名吉卜赛人和来自东部锡尔特省的移民之间发生争执并最终演变为数百人的械斗和枪战，直到特警介入，械斗方才得到平息。械斗事件一时间成为波及土耳其全国的恶性新闻。伊斯坦布尔也因此而被称为“土耳其的得克萨斯州”^①。

愈演愈烈的治安问题给伊斯坦布尔市政管理带来巨大压力。在组建正发党之前便担任伊斯坦布尔市市长的埃尔多安就曾认为棚户区问题严重威胁大城市的秩序、阻碍文明程度，并建议用迁移证（土耳其语：Nakil ilmuhaberi）的形式来严格限制这种无序迁移。^② 埃尔多安在担任总理后的一次公开演讲中也重申其试图采用“迁移证”来限制无序移民的政策构想。在演讲中，埃尔多安还以诘问的语气讲到：“你来伊斯坦布尔干什么？你在伊斯坦布尔有工作吗？你在伊斯坦布尔有房子吗？”^③ 需要注意的是，埃尔多安及其政党反复宣称同情棚户区居民及其他社会中的边缘群体。但就棚户区这一问题本身而言，他的政策表态又无疑是反对无序移民和棚户区问题的。从这一点来看，可见棚户区问题本身的严峻性。

（三）正发党在伊斯坦布尔的崛起

截至2000年伊斯坦布尔接近65%的建筑是棚户区。鉴于棚户区居民平均家庭人口数量相对较大，其整体选民的数量更是接近整个伊斯坦布尔的75%左右。^④ 伊斯坦布尔深刻的人口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最终在历次的全国议会选举和地方选举中体现出来。自1983年军政府统治结束和1984年伊斯坦布尔大都会区设立以来，伊斯坦布尔已经举行了7次地方选举（Yerel seçimleri）和9次有效的

^① Tahire Erman and Aslyhan Eken, “The ‘Other of the Other’ and ‘unregulated Territories’ in the Urban Periphery: Gecekondu Violence in the 2000s with a Focus on the Esenler Case, Istanbul,” *Cities*, vol. 21, no. 1, 2004, pp. 59–61.

^② 当年度全国总人口约为6850万人。可参见 Neslihan Demirtaş and Seher Şen, “Varoş Identity: The Redefinition of Low Income Settlements in Turke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3, no. 1, 2007, p. 99.

^③ 土耳其原文为“Neden İstanbul’a geliyorsun, İstanbul’da işin var mı, evin var mı?” 参见 <http://t24.com.tr/haber/erdogan-istanbula-vize-uygulansin-dedim-karsi-ciktilar-goc-engellenmeliydi>, 224412。

^④ Murat Cemal Yalcintan and Adem Erdem Erbas, “Impacts of ‘Gecekondu’ on the Electoral Geography of Istanbul,”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vol. 64, 2003, pp. 94–95.

全国议会选举 (Genel seçimleri)。^①

就地方选举而言,除祖国党(厄扎尔所属政党)和社会民主党(Sosyaldemokrat Halkçı Parti, SHP)分别赢得1984年和1989年两次选举外,伊斯坦布尔剩下的5次地方选举均为伊斯兰背景的政党所赢得。其中,繁荣党和美德党分别赢得1994年和1999年的选举,此后2004年、2009年和2014年三次地方选举均为后成立的正发党赢得。换言之,自1994年以后,伊斯兰背景的政党已经在伊斯坦布尔地区站稳脚跟。

就全国议会选举而言,1983年时伊斯坦布尔分为6个选区,祖国党赢得全部6个选区;1987年时伊斯坦布尔一共分为8个选区,祖国党赢得8个中的7个,社会民主党(SHP)赢得1个;1991年时,伊斯坦布尔一共分为9个选区,祖国党赢得了其中的8个,而此时已经初露锋芒的繁荣党赢得第九选区,并在其他选区有不俗表现。到1995年全国议会选举时,繁荣党(RP)在伊斯坦布尔三大选区的选举优势已经相当明显,其在伊斯坦布尔第一、第二和第三选区的得票率分别高达23.76%、25.13%和23.05%,且均拔得三大选区的头筹。但需要指出的是,繁荣党在伊斯坦布尔的优势并不是绝对的,祖国党(ANAP)、民主左翼党(DSP)和共和人民党等政党也均有不俗表现,三党各自得票率与繁荣党的差距并不大。^②换言之,在1991年之后和2002年之前,伊斯兰背景的政党已经开始逐渐在伊斯坦布尔站稳脚跟。

如果进一步观察2002年、2007年、2011年和2015年这四次全国议会选举结果,不难发现,正发党在伊斯坦布尔三个选区(2002年后整合为3个选区)赢得议席数整体呈增长趋势。比如在第一选区,正发党赢得的议席就从2002年的14席增加到了2015年的16席,在第二选区和第三选区的选举结果也大致呈上升或持平趋势。鉴于伊斯坦布尔在2002年至2015年的四次选举中的总议席增加了18个左右,因此考察正发党在三个选区赢得总议席数和所占三个选区议席数总量的百分比也有较大参考意义。首先,正发党在伊斯坦布尔三个选区赢得的总议席数显然有部分增长。其次,就其所赢得的席位所占三个选区总议席数的比例而言,其在四次选举中的整体占比均超过50%。换言之,正发党在全国人均

^① 实际上,自1983年以来土耳其一共举行了10次全国议会选举,但由于2015年6月份的全国议会选举选票分散,最终导致悬浮议会,故于2015年11月重选。故此次选举可视为无效选举。

^② Türkiye Büyük Millet Meclisi İnternet Sitesi (土耳其语大国民会议网站),“Türkiye Cumhuriyeti Millî Meclisi Genel Seçimleri: 1995 Yılı Genel Seçimlerinde Partilerin Aldıkları Oylar ve Oranları (土耳其共和国议会: 1995年议会选举各党得票及得票率),” https://www.tbmm.gov.tr/develop/owa/secimler.secimdeki_partiler?p_secim_yili=1995.

收入水平最高的伊斯坦布尔占据绝对的选举优势。

表9 伊斯坦布尔三个选区 2002—2015 年间历次全国议会选举基本状况

选区	包含市区		2002 年	2007 年	2011 年	2015 年 11 月
第一选区	Adalar Ataşehir Beykoz Çekmeköy Kadıköy Kartal Maltepe Pendik Sancaktepe Sultanbeyli Şile Tuzla Ümraniye Üsküdar	正发党	14 席	13 席	16 席	16 席
		共人党	10 席	8 席	11 席	11 席
		其他	0 席	3 席	3 席	4 席
小计	14 个市区		24 席	24 席	30 席	31 席
第二选区	Bayrampaşa Beşiktaş Beyoğlu Esenler Eyüp Fatih Gaziosmanpaşa Kağıthane Sarıyer Sultangazi Şişli Zeytinburnu	正发党	13 席	12 席	15 席	14 席
		共人党	8 席	7 席	9 席	8 席
		其他	0 席	2 席	3 席	4 席
小计	12 个市区		21 席	21 席	27 席	26 席
第三选区	Arnavutköy Avcılar Bağcılar Bahçelievler Bakırköy Başakşehir Beylikdüzü Büyükdere Çatalca Esenyurt Güngören Küçükçekmece Silivri	正发党	16 席	14 席	15 席	16 席
		共人党	9 席	7 席	9 席	9 席
		其他	0 席	3 席	4 席	6 席

续表

选区	包含市区		2002年		2007年		2011年		2015年11月	
小计	13个市区		25席		24席		28席		31席	
总计	39个市区	—	70席	正发党 (43)	69席	正发党 (39)	85席	正发党 (46)	88席	正发党 (46)
				共人党 (27)		共人党 (22)		共人党 (29)		共人党 (27)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七 结论

借鉴恰普泰等人的初步探索，本文继续深入探讨了城镇化与土耳其政治伊斯兰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集中连续地论证了以下四点。

第一，经济收入水平与伊斯兰政党的支持率呈负相关关系。分析发现，除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科贾埃利等人均收入偏高省份以及库尔德人聚居省份外，经济收入水平与正发党的支持率高度负相关。在土耳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历次全国议会选举、总统选举和全民公投中，经济收入水平差异与选民投票倾向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无不清晰可见。

第二，土耳其城乡居民之间存在明显的收入差异，意即乡村居民的人均收入远远低于城市居民。综合第一点和该点得知，乡村居民相较于城市居民更支持伊斯兰政党。

第三，土耳其20世纪80年代经济自由化改革以后大规模的城镇化导致大量中部省份和东部省份的乡村居民迁居主要城市。乡村移民（主要是青年男性）的大规模迁徙构成了该地区城镇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城镇化一方面实现了一定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城镇化带来了诸多严峻的社会问题。比如，移民人口集中涌向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或首都安卡拉，城镇人口的剧烈增长造成了极大的就业压力，大量青年人群陷入不稳定就业甚至完全失业的困境。与此同时，城镇地区的基础设施又往往未能与剧增的人口同步，城镇地区的住房形势严重恶化，大量贫民窟由此形成。原本就更倾向于政治伊斯兰的乡村居民在移居城镇地区以后基本上依旧维持着既有的政治倾向。随着城镇地区社会状况的恶化，城镇地区的乡村移民逐渐成为伊斯兰政党的群众基础（票仓）。

第四，在土耳其特殊的议会选举制度下，大规模的城镇化也使得伊斯兰政党原本分散且易于浪费的选民基础转移至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等关键选举省份。这种选民的转移使得伊斯兰政党支持者的选票效用以“聚零为整”的形式发挥出来。

正是得益于以上四点，土耳其伊斯兰政党在城镇地区和全国范围内的支持率不断上升并得到持续的巩固，这种支持率的上升则最终以地区选举和全国性议会选举的胜利体现出来。

透过全文的分析和结论可知，城镇化这一全球趋势并非全然积极正面。在缺乏城乡协调发展的社会，城镇地区势必成为全国核心资源的集中地，全国人口也将向极个别中心城市聚集，失业率增加、人口拥堵等社会问题也会接踵而至。更重要的是，城镇人口更容易实现政治动员。在政府不能有效引导民意的情况下，城镇人口增加带来的政治动员便利往往成为反对派崛起的关键社会背景。如此观之，顾炎武所谓的“人聚于乡而治，聚于城而乱”的论断仍不完全过时。

此外，为了避免重复前人研究和遵循社会科学研究的规范，本文仅选择了城镇化这一视角。这显然不可避免地忽视了对诸如国际格局、国内政治等其他核心原因的探索，似有挂一漏万之嫌。因此，本文欢迎其他具有创新价值的非城镇化视角解释的提出。

最后，凭借翔实的数据，本文在几处初步运用了量化方法和数据可视化的研究方法。这两种方法都有助于研究结果的清晰呈现。但由于部分数据的不可获得性，本文并未通篇运用。如有可能，本文亦欢迎进一步的钻研探索。

附表 1 土耳其省份中土双语对应表及各自议会席位分布

序号	土耳其语名称	中文名	议会席位
1	Adana	阿达纳省	14
2	Adyaman	阿德亚曼省	5
3	Afyonkarahisar	阿菲永卡拉希萨尔省	5
4	Ağrı	阿勒省	4
5	Amasya	阿马西亚省	3
6	Ankara	安卡拉省 (32)	18 (第一选区)
			14 (第二选区)
7	Antalya	安塔利亚省	14

续表

序号	土耳其语名称	中文名	议会席位
8	Artvin	阿尔特温省	2
9	Aydın	艾登省	7
10	Balıkesir	巴勒克埃西尔省	8
11	Bilecik	比莱吉克省	2
12	Bingöl	宾格尔省	3
13	Bitlis	比特利斯省	3
14	Bolu	博卢省	3
15	Burdur	布尔杜尔省	3
16	Bursa	布尔萨省	18
17	Çanakkale	恰纳卡莱省	4
18	Çankırı	昌克勒省	2
19	Çorum	乔鲁姆省	4
20	Denizli	代尼兹利省	7
21	Diyarbakır	迪亚巴克尔省	11
22	Edirne	埃迪尔内省	3
23	Elazığ	埃拉泽省	4
24	Erzincan	埃尔津詹省	2
25	Erzurum	埃尔祖鲁姆省	6
26	Eskişehir	埃斯基谢希尔省	6
27	Gaziantep	加济安泰普省	12
28	Giresun	吉雷松省	4
29	Gümüşhane	居米什哈内省	2
30	Hakkâri	哈卡里省	3
31	Hatay	哈塔伊省	10
32	Isparta	伊斯帕尔塔省	4
33	Mersin	梅尔辛省	11
34	İstanbul	伊斯坦布尔省(88)	31(第一选区)
			26(第二选区)
			31(第三选区)
35	İzmir	伊兹密尔省(26)	13(第一选区)
			13(第二选区)
36	Kars	卡尔斯省	3
37	Kastamonu	卡斯塔莫努省	3

续表

序号	土耳其语名称	中文名	议会席位
38	Kayseri	开塞利省	9
39	Kırklareli	克尔克拉雷利省	3
40	Kırşehir	克尔谢希尔省	2
41	Kocaeli	科贾埃利省	11
42	Konya	科尼亚省	14
43	Kütahya	屈塔希亚省	4
44	Malatya	马拉蒂亚省	6
45	Manisa	马尼萨省	9
46	Kahramanmaraş	卡赫拉曼马拉什省	8
47	Mardin	马尔丁省	6
48	Muğla	穆拉省	6
49	Muş	穆什省	3
50	Nevşehir	内夫谢希尔省	3
51	Niğde	尼代省	3
52	Ordu	奥尔杜省	5
53	Rize	里泽省	3
54	Sakarya	萨卡里亚省	7
55	Samsun	萨姆松省	9
56	Siirt	锡尔特省	3
57	Sinop	锡诺普省	2
58	Sivas	锡瓦斯省	5
59	Tekirdağ	泰基尔达省	6
60	Tokat	托卡特省	5
61	Trabzon	特拉布宗省	6
62	Tunceli	通杰利省	2
63	Şanlıurfa	尚勒乌尔法省	12
64	Uşak	乌沙克省	3
65	Van	凡城省	8
66	Yozgat	约兹加特省	4
67	Zonguldak	宗古尔达克省	5
68	Aksaray	阿克萨赖省	3
69	Bayburt	巴伊布尔特省	2

续表

序号	土耳其语名称	中文名	议会席位
70	Karaman	卡拉曼省	2
71	Kırkkale	克勒克卡莱省	3
72	Batman	巴特曼省	4
73	Şırnak	舍尔纳克省	4
74	Bartın	巴尔滕省	2
75	Ardahan	阿尔达汉省	2
76	Iğdır	厄德尔省	2
77	Yalova	亚洛瓦省	2
78	Karabük	卡拉比克省	2
79	Kilis	基利斯省	2
80	Osmaniye	奥斯曼尼耶省	4
81	Düzce	迪兹杰省	3

注：其中议会席位根据2014年人口普查数据分配。

资料来源：Directorate General of Press and Information, Prime Ministry, Republic of Turkey,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in Turkey*, 2015, p. 81.

附表2

正发党创始成员籍贯统计

序号	姓名	籍贯	所属地区 ^①	出生年份
1	埃尔多安 (Recep Erdoğan)	里泽省居乃苏	东部	1954年
2	阿克塔石 (Ahmet Aktaş)	马拉蒂亚省	东部	1951年
3	布玉克卡亚 (Alaattin Büyükkaya)	托卡特省	中东部	1950年
4	杜马诺鲁 (Ali Aydın Dumanoglu)	特拉布宗省	东部	1944年
5	巴巴江 (Ali Babacan)	安卡拉省	中部 (安纳托利亚地区)	1967年
6	阿尔斯兰 (Ali İhsan Arslan)	安卡拉出生, 籍贯迪亚巴克尔	东部	1969年
7	卡武希图 (Ali Yüksel Kavuştu)	乔鲁姆省	中东部	1937年
8	昂瑚尔蕾西 (Ayşe Böhürler)	开塞利省	中部	1963年
9	库尔陀璐 (Ayşenur Kurtoglu)	锡瓦斯省	东部	1962年

① 此处的“地区”并非土耳其国内政治地理中的几大区域，此处所谓的“地区”是地理意义上的地区。

续表

序号	姓名	籍贯	所属地区	出生年份
10	耶伊尔德勒姆 (Binali Yıldırım) ^①	埃尔津詹省拉法西野 (Refahiye)	东部	1955年
11	裕伦 (Halil Ürün)	科尼亚省玉纳克 (Yunak)	中部 (安纳托利亚地区)	1947年
12	库祖 (Burhan Kuzu)	开塞利省德威利 (Develi)	中部 (安纳托利亚地区)	1955年
13	盖蒂克利 (Bülent Gedikli)	特拉布宗省	东部	1964年
14	卡马吉尔 (Cemal Kamacı)	特拉布宗省	东部	1943年
15	渥拉尔 (Erol Oral)	埃尔祖鲁姆省	东部	1944年
16	古尔多安 (Ersin Nazif Gürdoğan)	埃斯基谢希尔米哈尔切克 (Mihalıççık)	中西部	1945年
17	撒拉乔鲁 (Fatih Recep Saraçoğlu)	布尔杜尔省	西南部	1952年
18	阿克希特 (Güldal Akşit)	马拉蒂亚省	东部	1960年
19	艾洛尔 (Gürsoy Erol)	托卡特省图尔哈 (Turhal)	中东部	1956年
20	扎布素 (H. Cüneyd Zapsu)	生于伊斯坦布尔, 籍贯 凡城省巴什卡莱 (Baskale)	东部	1956年
21	谷奈茜 (Habibe Güner)	博卢省	中西部	1958年
22	多阿内里 (Halil Caner Doğaneli)	安卡拉	中部 (安纳托利亚地区)	1949年
23	伊派克 (Haluk İpek)	阿马西亚省苏鲁沃瓦 (Suluova)	中东部	1963年
24	麦尔江 (Hasan Murat Mercan)	阿勒省图塔克 (Tutak)	东部	1959年
25	亚泽吉尔 (Hayati Yazıcı)	里泽省恰耶里 (Çayeli)	东部	1952年
26	恰拉希 (İbrahim Çağlar)	伊斯坦布尔	西部	1960年
27	易卜拉欣·厄扎尔 (İbrahim Reyhan Özal) ^②	生于英国伦敦, 籍贯 马拉蒂亚省	东部	1965年

① 现任总理。

② 土耳其前总统图尔古特·厄扎尔的侄子。

续表

序号	姓名	籍贯	所属地区	出生年份
28	阿尔巴伊拉克 (İlhan Albayrak)	伊斯坦布尔省	西部	1954年
29	萨菲 (İsmail Safi)	里泽省	东部	1968年
30	乌启马 (İsmet Uçma)	奥尔杜省法特萨 (Fatsa)	中东部	1955年
31	阿依瓦 (Lokman Ayva)	科尼亚省多安黑萨希 (Doğanhisar)	中部(安纳托 利亚地区)	1966年
32	布鲁特 (Mehmet Ali Bulut)	卡赫拉曼省	中部(安纳托 利亚地区)	1956年
33	代尼兹奥尔衮 (Mehmet Beyazıt Denizolgun)	伊斯坦布尔省	西部	1954年
34	古雷希 (Mehmet Hilmi Güler)	奥尔杜省	中东部	1949年
35	厄兹雷克 (Mehmet Özlek)	不明	—	—
36	特克里奥卢 (Mehmet Sayım Tekelioğlu)	开塞利省	中部(安纳托 利亚地区)	1950年
37	查武什奥卢 (Mevlüt Çavuşoğlu)①	安塔利亚省阿拉尼亚 (Alanya)	西南部	1968年
38	萨特茜 (Mihrimah Belma Satır)	埃尔祖鲁姆省	东部	1961年
39	卡克 (Muammer Kaki)	比特利斯省	东部	1950年
40	卡尔斯利 (Muharrem Karlı)	科贾埃利省伊兹密特 (İzmit)	西部	1938年
41	陀兹乔肯 (Muharrem Tozçöken)	埃斯基谢希尔省份	中西部	1946年
42	亚尔钦塔石 (Murat Yalçıntaş)	生于伊斯坦布尔, 籍贯安卡拉	中部(安纳托 利亚地区)	1965年
43	乌纳尔 (Mustafa Ünal)	卡拉比克省萨夫兰博卢 (Safranbolu)	中西部	1948年
44	艾克仁 (Nazım Ekren)	伊斯坦布尔省	西部	1956年
45	巴茜 (Nimet Baş)	卡拉曼省	中部(安纳托 利亚地区)	1965年

① 现任外交部部长。

续表

序号	姓名	籍贯	所属地区	出生年份
46	努拉依·渥拉尔 (Nuray Oral)	马尼萨省	西部	1936年
47	贾尼克里 (Nurettin Canikli)	吉雷松省	中东部	1960年
48	斐立兹 (Osman Nuri Filiz)	代尼兹利省恰尔 (Çal)	西南部	1950年
49	德内梅齐 (Reha Denemeç)	埃拉泽省	东部	1961年
50	厄兹托普拉克 (Remziye Öztoprak)	安卡拉省	中部 (安纳托利亚地区)	1949年
51	古齐率 (Sami Güçlü)	科尼亚省	中部 (安纳托利亚地区)	1950年
52	卡拉博艺柯 (Sema Karabıyık)	阿菲永省	中西部	1971年
53	拉马丹奥卢 (Sema Ramazanoğlu)	代尼兹利省	西南部	1959年
54	亚夏茜 (Serap Yahşi Yaşar)	安卡拉省	中部 (安纳托利亚地区)	1965年
55	君度资 (Süleyman Gündüz)	特拉布宗省	东部	1961年
56	迪希礼 (Şaban Dişli)	萨卡里亚省	西部	1958年
57	厄兹业伊特奥卢 (Tamer Özyeğitoğlu)	巴勒克埃西尔省	西部	1942年
58	阿尔特库拉奇 (Tayyar Altıkulaç)	卡斯塔莫努省德武雷卡尼 (Devrekani)	中北部	1938年
59	西门谢科 (Ceyhun Yasemin Şimşek)	不明	—	—
60	亚基尔 (Ziyaettin Yağcı)	锡瓦斯省	东部	1945年

注：凡有中文通译的皆遵循前人译名；没有的则皆为笔者结合土耳其语发音和实际内涵而翻译。比如，doğan 中文多通译为“多安”，故所有包含该词的人名均以“多安”译之。而 taş 本意“石头”，故所有带有该词的人名皆以“塔石”译之。

资料来源：Adalet ve Kalkınma Partisi (正义与发展党), *Founding Members*, <https://www.akparti.org.tr/english/yonetim/kurucu-uyeler#>。